

# 首任駐英副公使劉錫鴻的思想與 西洋觀感：以華夏觀為中心\*

伊藤桃子\*

## 摘要

晚清自強運動為中國近代化之開端，亦開啟了長久以來傳統知識分子所共有的「華夷世界觀」的新局面。設立外交機構、輸入國際法、普及北京同文館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所譯的西書，以及派遣駐外使節等，各種洋務政策提供晚清士人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對於他們如何認知世界，特別是西洋觀，均有深遠影響。

究竟晚清士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為何？新的西洋認知和傳統世界觀之間互相發生了什麼作用？兩者間又如何協調？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屬於機器、制度或思想層次？類此議題，學界過去已多有論及。但是有關晚清士人世界觀的嬗變等相關討論，仍較集中於洋務派，對於洋務派的研究亦較引人矚目，惟目前未足以掌握保守派的世界認知之整體面貌。

本文目的是，重新檢驗歷來較不受學者關注的保守派—晚清外交官劉錫鴻對世界的認識，從而試圖勾勒自強運動期間士人世界觀的各種面貌。本文將以劉錫鴻擔任駐英副公使期間所著的《英軺私記》與《劉光祿遺稿》為主，配合《郭嵩燾日記》等同時期清廷出使外國相關人員的一手紀錄、奏稿與檔案，探討他的政治思想與儒家思想、時代變局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釐清其親身經歷對世界觀的影響與其蛻變的軌跡。

**關鍵字：**劉錫鴻、保守派、西洋觀、世界認知、華夷觀念

\*大仁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彭明輝教授惠予本文初稿許多批評與意見，並蒙審查人惠賜修稿建議，特此致謝。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陳世榮、李鎧光的鼓勵與協助潤飾文稿，亦謹此一併申謝。

## 壹、前言

自強運動為清廷官吏與有識之士鑒於內憂外患，必須因時制宜，引進西方物質文明所推進的近代化運動。象徵其開端的是，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刊行 Henry Wheaton 撰《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長久以來，中國一向視對外關係為通商關係（朝貢貿易），而拒絕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推動外交關係。成立主管外交事務的新機構及國際法的輸入，意味著清國終於認清了近代國際關係，也體察出現實的需要，故而不得不改變傳統的政治建構和意識型態。隨著以條約關係為基礎的國際社會之輪廓日益清晰，而發展出近代外交制度，皆促使傳統士人，無論洋務派或保守派，原所共有的「華夷世界觀」<sup>1</sup>—原是根據中國與周圍國家的文化差異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即以禮教的存廢為準之國際關係—的改變。即是，前述自強運動的兩大象徵不僅是清國外交制度的一大創新，同時也可將該運動定位為傳統世界觀的轉捩點。再者，北京同文館及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譯的西書、派遣國外使節、設立駐外使館等一連串的洋務政策之外，晚清人士的外國史地引介、外國傳教士的譯書亦為晚清士人開啟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門窗，對他們的對外觀點，特別是西洋觀有所影響。

究竟當時晚清士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為何？新的西洋認知和傳統世界觀之間互相發生了什麼作用？兩者間又如何協調？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屬於機器、制度或思想層次？這些均為值得探討的問題。歷來學者較關注於洋務派新世界觀之形成與嬗變，相關研究亦較引人矚目<sup>2</sup>。然而，對於保守派世界認知的演變，則一向缺乏深入的評析。

探究其背後的原因，無疑地與 1980 年代以後自強運動在中國大陸受到重新評價有密切關係。大陸學者予以自強運動肯定性的評價，主要目的在於探索中共

<sup>1</sup> 有關華夷世界觀，請參考：佐久間重男，〈明・清から見た東アジアの華夷秩序〉，《思想》，796（東京，1990.10），頁38-51；濱下武志，〈東アジアに見る華夷秩序〉，《國際交流》，62（東京，1993.11），頁28-36；佐藤慎一，〈儒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國—社會と文化》，4（東京，1989.6），頁34-54；茂木敏夫，〈變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頁4-18等。

<sup>2</sup> 見佐佐木揚，〈同治年間後期における清朝洋務派の日本論—李鴻章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44.3（京都，1985.12），頁430-458；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佐賀，1990.8），頁162-200；茂木敏夫，〈近代中國のアジア觀—光緒初期、洋務知識人の見た「南洋」〉，《中國哲學研究》，1（東京，1990.8），頁94-119等。

「四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總之，他們將「四個現代化」與清末的自強運動聯結在一起，從而試圖塑造與賦予中共推動經濟改革政策的正當性。為此，相關研究便立足於將反對自強運動的保守派，視為封建主義者以進行批判。這樣一來，便形成了「保守派＝封建主義者」的刻板印象，研究者於是很少再去關心保守派方面，甚至部分學者在著作中有意、無意地附和此一刻版觀點，間接加強了它的說服力。大陸學者的研究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無可否認的，那些研究確實對日本史學界發揮了潛在的影響。舉例而言，戰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一書，在日本學界始終居於主導地位，致使過去日本方面的相關研究，多將自強運動視為帶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主階級所推進的改革運動。其影響，則致使日本學界對自強運動的評價，多帶有否定其作用與歷史地位的色彩。此後，以「四個現代化」的展開為契機，對於洋務派在近代化的貢獻方面，則普遍地被研究者肯定與接受；然而，在討論守舊派方面，研究者卻依然著眼於他們的保守性，而將他們的反洋務論一一列舉論證，單向性地解釋他們誠屬於「封建主義者」<sup>3</sup>。

過去的研究中，將一部分自強運動時期的歷史人物歸入「開明」、「先進」，而另一部分歸入「封建」、「落後」，這種二分法，正是問題的所在。藉由正反二分法的視角來考察史實，對歸入「開明」者一味稱譽，對歸入「封建」者批判貶斥。然而，許多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本身就帶有雙重性，進步與保守相互交織，很難涇渭分明地加以區分。再者，先進與保守，這兩種態度的存在都是特定時空、特定文化的產物，從長期歷史脈絡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兩者之間具有複雜的糾結關係。這種簡單化的二分法只不過是貼標籤罷了，是否有助於瞭解史實的多元層面？正如林家有所說，「只研究先進的文化人，忽視或輕視對保守的落後的文化人的研究，不能就文化的全部內涵和文化人的思想做全面的研究，就難於正確地全面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對於我們今天認識歷史的昨天也無益處。所以，研究歷史上的保守文化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sup>4</sup>。總之，論析呈現出繁複面貌的歷史時，透過改變考慮問題的角度，來思考至今尚未被注意到的層面，即是一個重要關鍵。

<sup>3</sup> 參見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吳安家，〈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41-64；大谷敏夫，〈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動向〉，收於大谷敏夫，《近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戰爭》（京都：同朋舍出版，1995），頁52-95。

<sup>4</sup> 林家，〈序言〉，收於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頁1-2。

本文目的是，著眼於向來不受學者所關注的保守派，試圖重新檢驗他們世界認知的建構。關於「保守派」一詞，又稱為守舊派、頑固派，如倭仁、李鴻藻、徐桐等皆屬之。雖然在中井英基等學者的研究中曾提及有關保守派的界定，但究竟應該如何定義，似乎仍處於起步階段，各家解釋亦言人人殊，尚未有定論<sup>5</sup>。在本文中，筆者將自強運動時期的保守派定義為：遵從中國文化，尤其是堅持儒家思想正統論者，而反對「洋務派」（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所推動的洋務政策，包括開礦、鐵路、電報及技藝學堂等之一派；又，就外交政策而言，保守派係根據華夷觀念，基本上採取排外主義立場者稱之。如前所述，有關自強運動保守派的研究，僅見零星的單篇論文，或散見於其他自強運動史的論著中，不僅數量鮮少，且有若干論點具有爭議性，故仍待更精詳、完備的研究。即使張宇權<sup>6</sup>已針對保守派劉錫鴻撰寫專書，然而，該書基本上仍未脫「開明者／保守者」與「進步／落後」二元對立的解釋框架，使其論述無法從更寬闊的視野進行系統性的討論，以致於在評價上明顯地表露出偏袒「開明者」的傾向（其他相關細節將在下文討論）。本文對於保守派傳統性的一面，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而只是承認這個存在的事實。站在此立場上，以保守派對世界的認識為討論對象，期為進一步瞭解在晚清傳統世界觀嬗變之複雜而多樣的跡象。

在實證研究上，本文以首任駐英副公使劉錫鴻所著的《英軺私記》與《劉光祿遺稿》為主，更配合駐英公使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等同時期清廷出使外國相關人員的一手紀錄、奏稿以及檔案等，探討劉錫鴻的政治思想與儒家思想、時代變局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釐清親身經歷對世界觀的影響與其蛻變的軌跡。

## 貳、研究回顧

### 一、研究取向

綜觀 1980-2007 年之間，日本、中國與臺灣三地的史學動向，有關劉錫鴻的論述大抵均屬郭嵩燾研究的陪襯性質<sup>7</sup>，專論亦較側重他的外交經歷。即使有關內政的部分，重點亦放在他的反鐵路論（1880）<sup>8</sup>；對其吏治思想的討論，則幾

<sup>5</sup> 中井英基，《張謇と中國近代企業》（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1994），頁28-32。

<sup>6</sup>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sup>7</sup> 例如：熊月之，〈論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紛爭〉，《華東師範大學學報》，50（上海，1983.6），頁75-81；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學術月刊》，4（上海，1995.4），頁76-81等。

<sup>8</sup> 有關劉錫鴻反對鐵路的原因，學者提出各種論點加以解釋，大抵如下：（1）抵拒西方文明的心態（傳統的儒家思想）；（2）對中國官民現狀認識的悲觀主義（pessimism）；（3）中西國情

乎未做深入的探究與分析。因此，當學者們探討清國危亡的緊要關頭，劉錫鴻為了救亡圖存而做出的選擇和行動時，似有不夠細緻的缺憾。再者，過去有關自強運動的研究，尤其是中國學者與受其影響的日本學者，在「進步史觀」主導歷史思維的情況之下，則有過於強調「保守派」阻礙近代化的一面之嫌，而陷入「進步／落後」的二元論述的迷思。換句話說，過去學界立論時，往往偏重某單一側面的理解，甚至將原本複雜的現象簡單化，較忽略各種文化質素之間的關聯性。為此，相關研究便將反對自強運動的保守派視為「封建主義者」來進行批判。以劉錫鴻為例，其進步與保守思想相互交織，二者並非涇渭分明，在研究上應更加多元地加以詮釋。可惜的是，過去的研究卻反而常常簡單地歸結於善惡論，而在以洋務派、維新派等所謂先覺者為主要的研究取向中，被相對簡化為落後的形象。因此，以劉錫鴻、倭仁等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雖然也在晚清思潮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針對其獨特性，乃至在時代潮流中其思想如何轉折、其言論的限度與其時代意義等議題，惟尚未足以掌握。由此可說，劉錫鴻的思想與行動仍有待進一步地進行整體性研究。

過去學者對劉錫鴻的見解約略可歸納為三項：(一) 劉錫鴻既是一個生硬的「頑固派」，又是厚顏無恥的「投降派」，即使在赴歐之後，其政治思想和西方認知也沒有任何轉變。換言之，即是對劉錫鴻抱持完全否定的態度<sup>9</sup>；(二) 注意到劉錫鴻的思想有所改變，因此不認為他的觀點完全是反洋務，且對於劉錫鴻有關西洋社會政教制度的認知，給予積極地讚譽<sup>10</sup>。也就是說，對於劉錫鴻出使後的思想演變給予十分肯定；(三) 劉錫鴻出洋之後，雖然修正原有的錯誤與偏見，

---

不同；(4) 人際關係之齟齬所致（即，起因於劉與李鴻章、郭嵩燾在政治上的對立）。自1980年代至現在，上述論點中值得注意者，第一項說法仍舊為學界的主流見解。其次，依個人淺見，首次指出第二項因素者，並非溝口雄三，而是坂野正高。但相關研究中鮮少提及，故特此說明。坂野正高，〈鐵道論—1879年の二つの意見書〉，收於坂野正高，《中國近代化と馬建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頁122-123。

<sup>9</sup> 例如：趙靖、易夢虹（主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391；厚候吉、吳其敬（主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162；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三民書局，1993），頁307；吳寶暎，《初出國門：中國早期外交官在英國和美國的經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頁89-90等。

<sup>10</sup> 例如：宮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5（北京，1987.9），頁119-128；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收於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頁269-299；茂木敏夫，〈劉錫鴻《英軺私記》の世界觀〉，《南京大學學報（社會史專輯）》，（南京，1989），頁107-112；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2)—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8.1（福島，1999.8），頁93-104；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113-301等。

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有一定的價值，但是他仍然堅持西法不能行於清國，對西方文化的認知亦僅止於器物層次而已<sup>11</sup>。

## 二、代表性著作

### (一) 1980 年代

有關劉錫鴻的研究專書，有鍾叔河、宮明、溝口雄三、茂木敏夫等論稿。在中國大陸，由鍾叔河〈劉錫鴻「用夏變夷」的失敗〉一文，開啟研究劉錫鴻的先河。1980 年代初的研究成果，大抵否認劉錫鴻的親身經歷對思想轉變的影響。此後的研究，也幾乎多在未經詳細論證的情況下援引此一觀點。但是，鍾叔河以《英軺私記》為切入點，針對他的思想演變深入探討，並論析劉錫鴻與郭嵩燾的相爭成因<sup>12</sup>。雖在史料上的運用上並不完整，但鍾文以較宏觀的角度對思想的轉折加以分析，奠定了相關的研究基礎，值得肯定。

宮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一文，基本上也沿襲鍾叔河所提示的觀點，指出「劉錫鴻出使英、德期間，親眼看到了這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和風土人情，使他的思想上發生了一定的變化」<sup>13</sup>，進而認為「劉錫鴻思想演變的更重要的一面，是在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教文化，進行了多方面的熱情讚譽」<sup>14</sup>。然而，劉錫鴻究竟根據什麼思維方式來給予西方社會肯定的評價，對此問題宮文則未進一步的討論分析。

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一文，是日本第一篇全面探討劉錫鴻的專論，其目的在對劉錫鴻「保守派」的見解重新給予評價<sup>15</sup>。溝口雄三指出，劉錫鴻反對鋪設鐵路，亦反對建造軍艦，其觀念仍然走的是保守路線；然而，他另一方面重視內政，而且以地方自治與君主立憲制為志向。就這一點而言，他的反洋務論，毋寧說是與所謂的「變法派」聲氣相通。對此，並木賴壽則反駁，劉氏理想中的政治是《周禮》之鄉官制（鄉舉里選），故稱他是「保守派」，基本上亦無過當之處<sup>16</sup>。此一論文，一直到現在仍屢獲引用，對日本的劉錫鴻研究有

<sup>11</sup> 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新莊，1999.6），頁 179-216 等。

<sup>12</sup> 鍾叔河，〈劉錫鴻「用夏變夷」的失敗〉，收於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38-259。

<sup>13</sup> 宮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5，頁 122。

<sup>14</sup> 宮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5，頁 123。

<sup>15</sup> 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 269-299。

<sup>16</sup> 並木賴壽，〈中國における《近代》への對應—自強運動をめぐる中國と日本の論争に觸れて〉，《季刊中國研究》，9（東京，1988.2），頁 97-106。

許多啟發。

茂木敏夫〈劉錫鴻《英軺私記》的世界觀〉一文，著眼於劉錫鴻如何認知西方世界，探討以「西洋衝擊」為契機，如何影響他的世界觀以及為何演變成全新的面貌。此文與過去偏重洋務派的研究不同，可謂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sup>17</sup>。至於討論劉錫鴻如何認知西方世界、他所據的認知框架為何方面，茂木指出，「近代大多數士大夫在『仁義』的名義下，否定西方文化的價值，然而劉錫鴻在『仁義』的名義下，卻發現了值得肯定的西方文化價值」<sup>18</sup>。換言之，劉錫鴻的思想特點，不是由保守而開明的「轉變」，也不是新、舊兩個觀念的「混合」，而是依靠自己原有的價值標準來稱頌西方國家。此一分析極具創見，與前人研究相比，具有較大的突破性。然而，由於茂木將「西洋衝擊」定位為劉錫鴻世界觀的轉捩點，而劉氏在身履目擊西方世界的前後，其思想究竟有什麼改變，則所談不多。再者，茂木在解釋劉錫鴻的政治論，尤其是內政論，諸如軍事、用人及理財等方面時，則缺乏深入的評析。

## （二）1990年代以後

直到1990年代後半，始有雷俊玲、手代木有兒、張宇權等研究者，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劉錫鴻的思想與行動作詳盡的分析與解讀，特別是對他如何認識西方，有了更全面的瞭解。迄今為止，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一文，是臺灣唯一一篇研究劉錫鴻的期刊論文<sup>19</sup>。該文主要是利用劉錫鴻駐歐一年餘所寫的《英軺私記》一書，探究與討論駐歐經驗對劉錫鴻認知西方世界的重要性。雖然該文在史料的蒐集已漸趨完備，亦深入分析劉氏在出使期間的作為與想法，然而尚有若干重要資料與著作，雷文卻未曾引用。又，雷文的論述中，亦有部分值得再商榷之處。諸如，第一，劉錫鴻的反鐵路論，雷文在論述方面，似乎過於簡略。雷文以劉氏上奏〈倣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摺〉（1881）為例，論斷「他的見識實在不高明，心態的確保守」<sup>20</sup>。但是，劉錫鴻反對建造鐵路，原來是從機器造成清國民眾失業的角度來反省<sup>21</sup>，他的反對觀點已經與只依據「破壞傳統風俗」的保守人士，迥然不同。這一觀點，我們亦可以從劉錫鴻參

<sup>17</sup> 茂木敏夫，〈劉錫鴻《英軺私記》的世界觀〉，《南京大學學報（社會史專輯）》，頁107-112。

<sup>18</sup> 茂木敏夫，〈劉錫鴻《英軺私記》的世界觀〉，《南京大學學報（社會史專輯）》，頁108。

<sup>19</sup> 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170-216。

<sup>20</sup> 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212。

<sup>21</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始見火輪車〉，收於鍾叔河（主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6），頁63。〈始見火輪車〉云：「然以行諸中國，則裸股肱、執策綏、操舟挽輦以度載人貨者，莫不盡廢其業」。

觀泰晤士報 (*The Times*) 後發出的感想中得知<sup>22</sup>。劉氏返國後，反鐵路論的基調，轉變為透過遊歐經驗得到的悲觀主義 (pessimism)，即對清國官民現狀的懷疑心，論據與視野亦更為多樣、多角度。總之，〈倣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摺〉一摺，基於官吏貪墨，與其所衍生對官民隔閡和陋習民風等認識，實與一般保守派的觀點大異其趣<sup>23</sup>。在討論劉錫鴻的思想時，確實很容易陷入保守派的刻板印象，試究其實，保守思想固為一個重要因素，然西洋體驗所引發的內省自覺，亦為一條不可忽視的線索。其次，雷文對於劉氏旅歐的若干問題，則尚有討論不夠深入之處。例如，劉錫鴻在前往英國的旅途中，詳細觀摩馬爾他 (Malta) 島與直布羅陀 (Gibraltar) 的砲台，抵達英國不久又參觀倫敦東南喀墩 (Chatham) 砲台。關於其參觀理由，雷文僅曾說到：劉錫鴻以軍旅出身，對防禦工事的建造極為留意<sup>24</sup>。但是，此一說明卻無法回答倭仁 (蒙古正紅旗人)<sup>25</sup> 等，與劉氏同樣具有軍旅背景之保守人士，他們為何反對引進西方軍事技術的質疑。

手代木有兒的一系列研究，是關於清季首批駐英使臣郭嵩燾、劉錫鴻以及張德彝之世界觀，並從「文明觀」的角度來加以分析<sup>26</sup>。作者討論有關首次遣使駐外的經緯，除分析清國國內的政治背景外，亦論及「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此一英國的時代精神<sup>27</sup>，進而全面性地掌握相關的歷史背景，值得注目。劉錫鴻自 1876 至 77 年出使英國，並在《英軺私記》寫下對英國的觀察，對英國多有讚賞之處；然而，劉氏描寫英國社會黑暗面的段落卻鮮少。對此問題，手代

<sup>22</sup> 劉錫鴻 (撰)，《英軺私記》，〈觀戴晤士報館〉云：「是二萬數千人之生命，托於此矣，何為必用機器，以奪此數萬人之口食哉？」，頁 99。

<sup>23</sup> 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 272-273。

<sup>24</sup> 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 195。

<sup>25</sup> 倭仁 (1804-71)，京師保守勢力的領袖之一，向來反對總理衙門所推動的自強運動。他雖出身蒙古世系，但卻為時人公推為當時繼承程朱之學的三位理學家之一。自 1850 年代起，歷任各官職，如翰林院學士、內閣大學士兼皇帝太師等，均牽涉學術，在當時官員中聲望甚高。他所提倡的嚴律主義深深地影響到曾國藩的思想。過去倭仁在中國與日本的史學界被視為保守派之領袖，對他的評價大都為否定性居多，專論亦極少。但 1990 年代以後，隨著保守主義思潮研究的深化，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研究逐漸出現。見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史革新，〈倭仁與晚清理學〉，《中州學刊》，4 (鄭州，1997.4)，頁 154-159；馬秀平，〈倭仁理學思想論略〉，《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16 (福州，2002.3)，頁 1-5；公一兵，〈走近洋務運動中的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8.6 (呼和浩特，2002.12)，頁 18-22。

<sup>26</sup> 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 (1877-79) 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1)—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7.1 (福島，1998.7)，頁 1-16；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 (1877-79) 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2)—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8.1，頁 93-104。

<sup>27</sup> 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 (1877-79) 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1)—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7.1，頁 9。

木有兒所提的「文明化使命」—西方對非西方世界啟蒙近代性的努力，似乎為劉錫鴻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條研究路徑和詮釋的方法。對身為首批駐英使節的劉錫鴻而言，這是否意味著劉錫鴻將接受身為西洋近代文明旗手的大英帝國，試圖藉以宣揚「文明」表象之政治意圖嗎？作者似乎未能對此問題繼續深入探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認為劉錫鴻對西洋的認識，不僅止於機器層次，且已邁向制度層次，而這個觀點則與雷俊玲的見解完全相反。手代木有兒將關懷重心擺在西洋體驗對傳統知識人的影響，採取多線索的探討方式，可說是論析劉錫鴻的重要著作。然而，劉錫鴻對於當時西歐的外交局勢，即「勢均力敵」（均勢，Balance of Power）、「會議外交」（Conference Diplomacy）與土俄戰爭等現象作何瞭解？他又認為清國與西洋之間應該建立何種國際關係？關於這些問題，作者則尚未觸及。

張宇權的大作《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sup>28</sup>一書，以紮實深厚的史料為基礎，從多元角度論析劉錫鴻的保守思想之淵源、特點與其蛻變的過程。該書探討的內容，並不侷限於歷來學者所關注的駐英期間之作為，亦論述任駐德公使期間的事蹟與其思想的變化，實有助於填補前人研究的空缺，值得肯定<sup>29</sup>。然而，如同該書第六章〈對劉錫鴻保守思想的思考〉的內容所示，作者透過比較劉錫鴻與郭嵩燾的言論，試圖藉以追溯「保守」與「開明」的分歧，而將關懷的重心放在兩人的思維隔閡之上。但是，作者卻未將劉錫鴻放入 1860-70 年代保守思潮的時空背景與思想環境中，去探究與釐清劉錫鴻之思想脈絡的特點與實質意義。故可知其論述架構，基本上仍以「開明者／保守者」二元對立的概念作為討論基礎，也並未完全脫離「進步／落後」二分法的解釋框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作者固然體會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卻反而陷入了「開明／保守」的簡化邏輯與解釋框架，籠統地討論保守思潮，而忽略了晚清保守思潮的複雜內涵與其多元性。倘若劉錫鴻思想的基本特點，相較於其他保守人士，「在於複雜性和保守性」<sup>30</sup>，那麼劉氏的保守性與其他保守主義者究竟有何具體差異？張宇權雖一再強調「變與不變交替的現象，是劉錫鴻思想複雜性的表現」<sup>31</sup>，且其現象是「在當時的封建士大夫是具有普遍性的」<sup>32</sup>，那麼到底變的是什麼？不變的是什

<sup>28</sup>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sup>29</sup> 本書在刊行後，臺灣學界有一篇書評作為回應。見潘光哲，〈書評：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漢學研究》，23.1（台北，2005.6），頁509-513。

<sup>30</sup>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88。

<sup>31</sup>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89。

<sup>32</sup>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89。

麼？複雜在什麼地方？劉氏的保守性格，究竟是否能簡單的歸因於他個人思想上的基本特點？這種特點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又是普遍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似乎都仍待進一步的論證。

更重要的是，張宇權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也過於簡略，而容易將其得出的結論簡單化。例如，張著中雖然詳細徵引《英軺私記》進行分析與論述，特別是劉錫觀察英國議會，對其形式、規制的介紹極為詳盡，無論上下院、選舉、政黨、議事、表決方式等皆一一存錄。但是，劉錫鴻為何如此詳盡的紀錄呢？張宇權指出：「面對一個陌生國家，劉錫鴻對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充滿著好奇」，到英國後「就急著去觀看了英國議會情形」<sup>33</sup>。果真如此嗎？出於好奇而已嗎？誠如1980年代的研究者已經指出<sup>34</sup>，鴉片戰爭以來，知識分子對議會制度的關注，早在自強運動之前，已表現在《海國圖志》、《瀛寰志略》與《大英國志》等著述中。自強運動時期，也已表現在《乘槎筆記》、《航海術奇》、《歐米還遊記》及《初使泰西記》等論述中。至於刊行在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的《申報》、《萬國公報》等報紙，亦逐漸能看到介紹西歐議會制度的相關文章。再則，1875年軍機大臣文祥，也已密奏主張議會制度雖在中國勢不可行，但其聽從民意的旨趣，則有所可觀<sup>35</sup>。由此看來，劉錫鴻之所以會極為詳盡地介紹議會的形式與實際運作，似乎與晚清士人對議會制的關注趨勢息息相關。筆者認為，討論劉錫鴻的思想與行動時，似乎不能僅僅侷限於討論劉錫鴻本人，必須要將他置於時代的脈絡之下進行探討，否則極易做出不完整的推論。

最後，就問題意識而言，在日本學界，劉錫鴻研究原是以挑戰小野川秀美的「階段論」為出發點<sup>36</sup>，研究焦點不是對於其保守思想的特殊性進行探討，而是

<sup>33</sup>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199。

<sup>34</sup> 溝口雄三，〈近代中國像の再検討〉，收於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49-50。

<sup>35</sup> 見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清史稿·列傳·文祥》（台北：鼎文書局，1975-1981年），卷386，列傳173，頁11690。「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

<sup>36</sup> 1960年代，小野川秀美在《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中，針對傳統思想的轉折—從考據到今文經世，再度轉進變法論的過程，或義理經世與公羊經世之間的彼此交錯互動等論題，進行了多層次、整體性的研究。其所開創的分析方式，即「階段論」，為日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分析基礎。「階段論」將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脈絡歸納為「自強—變法—辛亥」三個階段，也認為這三個遞進的過程代表了晚清思想轉折的歷程。直到1980年代，溝口雄三才在〈再び「近代中國像」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對「階段論」表示質疑，進而提出替代性的解釋架構，並以「基體」的概念，來說明傳統思想的演變與其發展的軌跡。溝口指出，「階段論」所論述的，只不過是以追隨西洋政治體制上的變化為主軸，而據以評定三者歷史價值上的優劣，從而忽略做為「非西方」的內在性因素，導致研究方法上欠缺歷史縱深的基礎。

在論證他與變法派間聲氣相通的地方自治與君主立憲制之志向。嚴格說來，研究的核心問題，在於抽繹出劉錫鴻的反洋務論與變法論的勾聯，故相異於變法論的保守思想，則著墨鮮少。對此學術動態，張著中則未曾觸及。因此，在張著的相關章節中，倘若能如同本文詳細羅列中國、港、台與日本的相關著作，並將研究的性質及視野相近，或相關性強的著作歸併成類，俾便讀者看出其論點的異同與相關性，或許能使讀者能更清楚地掌握學術研究之脈絡。

## 參、赴歐洲前（1874-76）之政治論與西洋觀

### 一、劉錫鴻的生平事略

劉錫鴻，原名錫仁，字雲生。廣東番禺縣人，原籍新會縣沙滘鄉，生卒年不詳<sup>37</sup>。1843年中舉人（恩科），曾為廣西右江道張敬修的幕僚，參與平定太平天

---

換句話說，「階段論」不外乎是在自強（落後）與革命（進步）中間，輕易地插入變法而成的歷史圖像。他同時指出：無論探討近代中國或近代日本，或是總括近代亞洲而加以分析時，首先必須以「前近代」的歷史要素（基體）為根本，並針對其變化或展開的面貌，在獨特的層面上加以釐清。由此延伸，溝口教授以首任駐英副公使劉錫鴻為切入點，試圖重新評估以「自強—變法—辛亥」為解釋基調的思考典範。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0）；溝口雄三，〈再び「近代中國像」をめぐって—近代史像の再検討〉，《史潮》，19（東京，1986.7），頁12-41。另，坂元ひろ子則批判「基體論」，主張「基體論」雖從長期連續觀點而立論，但終究只是站在「西洋／東洋」這個二分法的「內發史觀」，故此「基體論」亦並非完全地脫離二元論述的桎梏。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一文，固然將中國與西方置於對立地位，但也針對「重農抑商的封建頑固派」、「厚顏無恥的攘夷論者」等刻板印象，重新給予評價，進而描繪在晚清先進與保守之間的複雜糾結；這些都證明近代中國最具典型意義的時代特徵，乃在於各類因素的多歧互滲。因此，即使該文自發表後已歷經約二十多年，至今卻也仍未失去其學術意義。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思想》，849（東京，1995.3），頁61-84。

<sup>37</sup> 劉錫鴻生卒年，《清史稿》、《清史列傳》等中都無記載，僅知他生於6月26日。見郭嵩燾（撰），《郭嵩燾日記》，3（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63。在《番禺縣續志》與《碑傳集三編》中，則記載了有關他的事蹟。又，依據《光緒朝東華錄》，劉氏於1881年上書彈劾李鴻章，結果失敗，反被罷黜去官，而於數年之後死於北京。《碑傳集三編》又云，劉錫鴻遭革職後，仍居京師，數年卒。故可推知，劉氏可能卒於1880年代初至中期。另外，雷俊玲根據*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報導，推測劉氏約生於1822-23年。由此可以推算，劉錫鴻可能生於道光初年，卒於光緒初年，享年約六十多歲。參閱：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番禺縣續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49（台北：成文出版社1931年排印本影印，1967），頁1；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058；汪兆鏞（輯），《碑傳集三編》，17《劉錫鴻傳》，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991；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183。

國事件。因策畫奇謀，抗太平軍有功，受張敬修的保獎成為內閣中書。直到咸豐年間，又與張敬修抵抗英軍侵略，克復廣州東砲台，獎刑部員外郎。時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銜的毛昶熙聞其名，奏請隨營，劉錫鴻遂在毛昶熙之下督辦河南團練，盡力平定捻軍，因功加道台。1864年，受署廣東巡撫的郭嵩燾<sup>38</sup>之邀，與史澄、陳璞與樊封等人任其幕友兩年餘，負有督辦廣東團練總局的職責。1866年，郭嵩燾因人事糾葛遭到撤職而返回湖南湘陰，劉錫鴻復任刑部員外郎而入京，更結識張之洞<sup>39</sup>、李慈銘<sup>40</sup>、王闈運<sup>41</sup>等京師人士。在京任職期間，又隨同毛昶熙了結天津教案（1871），並與郭嵩燾議論時局、評論洋務。（參見圖1）

1876年10月，授光祿寺少卿，奉命以二品頂戴。同月，為了解決馬嘉理事件（1875），以副公使的身份隨首任駐英國大使郭嵩燾赴倫敦就任<sup>42</sup>。駐英期間，與日本元老院議官井上馨<sup>43</sup>交游，井上馨亦曾屢次造訪劉錫鴻。翌年三月，劉錫鴻轉任駐德國大使，但赴任後僅僅九個月即解職卸任（1878年8月25日）歸國。此一卸任事件，係源於劉與郭之間的爭執所致<sup>44</sup>。回國後，歷任通政使參議等職，

<sup>38</sup> 據《郭嵩燾日記》的記載，劉錫鴻與郭嵩燾於1863年12月6日在廣東廣州初次見面。見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4。

<sup>39</sup> 《湘綺樓日記》1871年4月24日有劉錫鴻與張之洞等人拜訪王闈運的記載。「劉雲生、許仙屏、倪豹岑、高仲陶、張香濤先後來，曉岱招同諸君飲」。見王闈運（撰），《湘綺樓日記》（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同治十年三月五日，21a。

<sup>40</sup> 李慈銘曾評論劉錫鴻云：「其人已老，雅以經濟自許」。李慈銘（撰），《越縵堂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桃花聖解齋日記〉，光緒二年八月十五日、丁集二，92b。

<sup>41</sup> 《湘綺樓日記》記載，1871年4月23日王與劉錫鴻兩人認識，經過多次交談，建立了友誼。詳見張宇權，〈論劉錫鴻出使前的社會交往〉，《學術論壇》，162（2004.1），頁154-157。

<sup>42</sup> 學者對於劉錫鴻出使的討論甚多，其中較具代表性者有鍾叔河、曾永玲、王維江、張宇權等。鍾叔河、曾永玲根據《玉池老人自敘》等資料的記載，認為劉錫鴻出使的主要原因是軍機大臣李藻鴻派去箝制郭嵩燾。對此一點，王維江提出質疑《玉池老人自敘》這份資料的可靠性的問題，並認為李藻鴻等是否有能力影響此一任命，仍尚待考證。張宇權亦指出過去研究所據史料的來源均有片面性，而依照《郭嵩燾日記》與當時官界的勢力關係，主張劉錫鴻之所以能出使英國，是因為郭嵩燾與毛昶熙等人的推薦。見鍾叔河，〈劉錫鴻「用夏變夷」的失敗〉，頁242,247；曾永玲，《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大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頁261,269,270；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學術月刊》，4，頁76-81；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131-138。

<sup>43</sup> 井上馨（1835-1915），日本周防國（今山口縣山口市）人。政治家。明治維新後，歷任民部大輔、大藏大輔、山口縣令等。1876年2月，以特命副使的身份隨全權大使黑田清隆赴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日韓友好條約）。同年9月至翌年7月，在倫敦深造，進行財政經濟方面的研究。歸國後，就任參議兼公部卿、外務大臣、農商務大臣、內務大臣、大藏大臣等要職，並推動以鹿鳴館為象徵的西化政策，為改正不平等條約而奔走。年八十一病逝，諡惟精。劉錫鴻在英國所見所聞的寫成的《英軺私記》有〈井上馨談學西洋〉、〈與井上馨談寶藏〉、〈井上馨論林文忠〉等項，可見劉錫鴻在倫敦與井上馨有深厚、密切的交往。參見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頁119-120,125,142-143。

<sup>44</sup> 劉錫鴻與郭嵩燾在出使期間，二人始終處不來，彼此互相牽制、掣肘。除郭嵩燾所奏的〈為

亦成為第一次反鐵道運動（1880-81）之急先鋒。1881年3月，因劉錫鴻上疏彈劾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sup>45</sup>為「其跋扈不臣，儼然帝制」，招致慈禧盛怒而被革職，數年後卒。

劉錫鴻之著作，除有《劉光祿遺稿》<sup>46</sup>之外，尚有《英軺私記》<sup>47</sup>、《日耳曼紀事》與《劉錫鴻任內卷略》<sup>48</sup>等。《劉光祿遺稿》涵蓋了自強運動期間，是劉錫鴻於平日盱衡世局、關心國事時，所產生具有思想性、評論性的作品；此外，

特參出使德國之劉錫鴻任性妄為請撤回）與〈以李鳳苞接辦德國公使務撤銷劉錫鴻一切升階仍回部當差〉之外，《郭嵩燾日記》的記載中，處處可見郭氏的狂怒之態。對此，劉錫鴻亦上奏〈劉錫鴻摺特參郭嵩燾〉，彈劾郭氏的十大罪狀。關於兩人發生不合與衝突的時間、原因與經過，在前述多位研究者的專論中均已提及，故此處不擬贅言，僅要點摘引如下：（1）塞海防之爭（1874-75）時，兩人關係已出現裂隙，主要原因包含有性格衝突的成分與政見相左（鍾叔河）；（2）討論遣使之際，郭嵩燾雖奏保劉氏為參贊（1876），卻因「國書事件」（1877）挑起事端而激化雙方衝突，隨後因劉氏與郭氏之間的新、舊思想分歧，致使兩人的關係完全地決裂（熊月之）；（3）在劉錫鴻獲得副使職位的同時，郭氏與劉氏的關係逐漸出現隔膜，又在北京發生編修何金修彈劾郭嵩燾之事件（1877），遂造成兩人關係徹底破裂（王維江）。另外，張宇權亦援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來進行探討。見鍾叔河，〈劉錫鴻「用夏變夷」的失敗〉，頁238-259；熊月之，〈論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紛爭〉，《華東師範大學學報》，6，頁75-81；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學術月刊》，4，頁76-81；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154-179。此外，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為特參出使德國之劉錫鴻任性妄為請撤回〉、〈以李鳳苞接辦德國公使務撤銷劉錫鴻一切升階仍回部當差〉與〈劉錫鴻摺特參郭嵩燾〉三份奏摺，皆是《劉光祿遺稿》中未收錄者，三摺只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這三份奏摺，上述張宇權的著作中有詳細的介紹與分析。

<sup>45</sup> 劉錫鴻與李鴻章的關係，可溯源於塞海防之爭。當時劉錫鴻曾寄給李鴻章〈復李伯相書〉等信函，但這些信件皆是討論政策，無法據此揣度兩人的交往關係與深度。然而，劉錫鴻駐英期間，亦曾寫信給李鴻章（1877年3月21日），或許可說，無論二人的關係如何，至少劉錫鴻與李鴻章之間一直互有聯繫。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復李伯相書〉，收於楊家駱（編），《自強運動文獻彙編》，1（台北：世界書局，1963），頁272-277；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總論英國政俗〉，頁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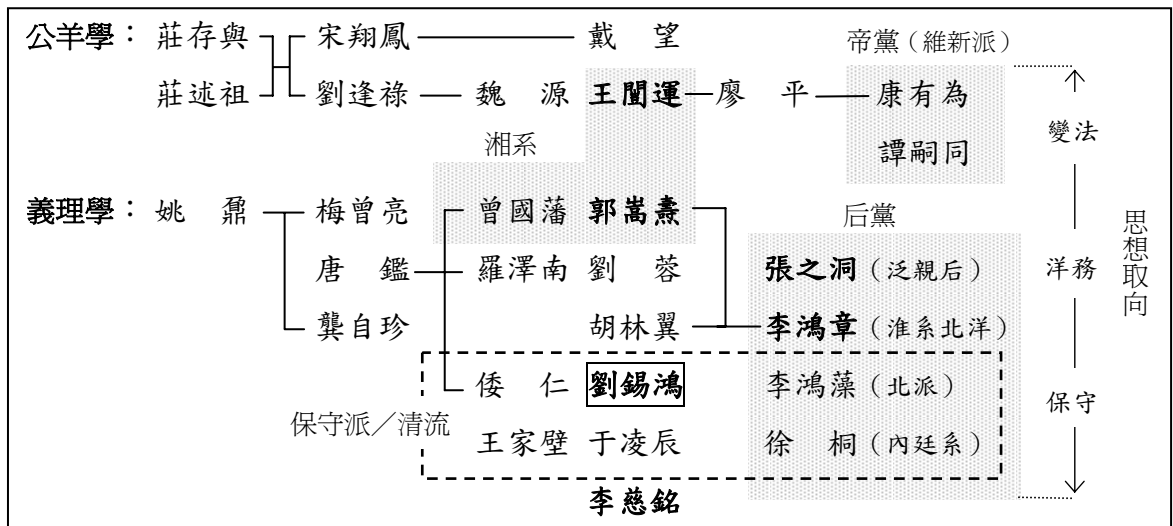
<sup>46</sup> 以下在本文中，使用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收於楊家駱（編），《自強運動文獻彙編》，1（台北：世界書局，1963），頁272-301。

<sup>47</sup> 《英軺私記》（1895年刊行）主要是劉錫鴻在出使英國期間（1877年1月21日-11月13日），所做的訪視與其觀感的記錄性文獻，內容包括了雜記、遊記與交談紀錄。劉錫鴻在英時期，除例行的茶會、舞會等社交活動之外，亦主動積極地參觀了議院、法院、監獄、學校、報社等機構，各種工廠以及美術館、博物館，並加入倫敦當地之俱樂部，觀賞賽馬、煙火等各種活動。這些閱歷在《英軺私記》中都有豐富而清楚的記錄。以下，在本文中將使用的版本，為劉錫鴻（撰），《英軺私記》，收於鍾叔河（主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頁47-212。

<sup>48</sup> 所謂《日耳曼紀事》，即是指〈德國程遞國書情形〉、〈德國議政院〉等，也就是劉錫鴻駐德一年之餘所寫的九項記事之總稱。以下，在本文中將使用的版本，為劉錫鴻（撰），《日耳曼紀事》，收於鍾叔河（主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頁213-225。另外，《劉錫鴻任內卷略》一書，為劉錫鴻所寫的奏摺與總署給劉錫鴻之文件彙編成書。劉錫鴻（撰），《劉錫鴻任內卷略》，收於劉錫鴻（撰），《駐德使館檔案鈔》（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亦收錄對郭嵩燾的時事論加以批評的〈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反對鋪設鐵路的〈縷陳中西情形種種不同火車鐵路勢不可行疏〉以及〈復李柏相書〉、〈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丞書〉等信函數篇。若要探究劉錫鴻當年西遊之前所抱的價值觀，《劉光祿遺稿》所載之〈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復李柏相書〉、〈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丞書〉，正好是最佳的研究素材。另外，上述《英軺私記》，曾為曾紀澤<sup>49</sup>等輾轉閱讀，與郭嵩燾《使西紀程》等著作，同樣對當時有識者的西洋認知深遠影響。

圖 1：劉錫鴻的交游關係（粗字部分）與思想系譜



資料來源：整理自大谷敏夫，〈清末經世思想の二大潮流〉，收入：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舎出版，1995），頁120；中井英基，《張謇と中國近代企業》（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1994），頁28-32,44-58等。至於李慈銘的定位，學界目前尚未有定論，坂野正高等學者則將他列在清流之內。

## 二、出使前的政治思想與西洋認知—以「塞海防之爭」時期（1874-75）為中心

1871年冬，琉球宮古島漁民五十四名遭風漂流到臺灣東岸，在八瑤灣附近

<sup>49</sup> 曾紀澤（1839-94），字劼剛，一字夢瞻，湖南湘鄉人，曾國藩長子。曾氏才猷練達，任事勤能，有古名臣之風。為了解決伊犁危機（1871-81），擔任出使俄國的欽差大臣，前往俄京聖彼得堡，簽訂聖彼得堡條約（1881），一般認為這個和平協議是清國外交上之勝利。另外，他也以身為自強論的理論家而馳名，1887年發表的〈中國先睡後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雖受到各國外交官的關注，但為變法論立場的何啟、胡禮垣激烈抨擊之。1888年，擢兵部右侍郎，尋與英人議定洋藥稅釐併徵條約。有關〈中國先睡後醒論〉，請參閱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頁12-50。曾紀澤做為郭嵩燾的後任者，在赴歐洲時（1878），他所帶去的文獻即為劉錫鴻的《英軺私記》。郭嵩燾是曾國藩的換帖兄弟，又是兒女親家，故曾紀澤攜帶劉錫鴻的《英軺私記》，此事讓郭嵩燾感到困窘，不難想像。

被臺灣「生番」殺害。明治政府為明確表示琉球為日本所屬，遂以該事件為染指臺灣的藉口，積極準備征臺<sup>50</sup>。1874年2月6日明治政府正式決定出兵臺灣，4月4日設置臺灣蕃地事務局，並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臺灣蕃地事務都督。在美、英駐日公使的抗議下，明治政府乃決定延期征台，但西鄉都督不顧日本政府該項決定，強行出兵臺灣。明治政府亦對出兵舉措進行事後承認，史稱牡丹社事件（臺灣事件）。然而，征台日軍由於遭受酷暑與熱帶傳染病的襲擊，該事件在尚未釐清琉球歸屬問題的情況下，清日雙方便於1874年10月31日簽訂《北京專約》，清廷承認賠償撫恤金十萬兩予難民遺屬，並賠款四十萬兩補償日本在台修道路、營建兵舍之費，以作為日軍撤兵的條件。此一事件暴露出清國的自強政策，特別是海防建設之空虛，也給予清廷極大的打擊。清廷終於認識到創辦近代海軍、建立海防的必要性，同時也令治臺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轉變<sup>51</sup>。

在《北京專約》簽字以後的四天，即1874年11月4日，滿洲大員恭親王奕訢與文祥對海防之不當提出警訊，同時以總理衙門的名義上了一道「切籌海防」疏，提出旨在加強海防的「六條辦法」（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同日，清廷命軍機處將總理衙門的奏摺抄出密寄予地方大吏，包括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沿江將軍、督撫等十五名，要求限於一個月內覆奏籌辦海防的具體策略。11月21日，軍機處將前江蘇巡撫丁日昌的覆奏（所謂「丁日昌六條」）抄送給十五名官員，再次徵詢意見。以「六條辦法」與「丁日昌六條」為契機，引發了反對左宗棠所指揮的西征，主張將塞防之餉轉為海防之用的「海防論」（直隸總督李鴻章、江西巡撫劉坤一、福建巡撫王凱泰）與有鑒於俄國侵佔伊犁的現狀，主張須先鞏固西北邊防、收復新疆的「塞防論」（即「疆防論」，陝西總督左宗棠、湖南巡撫王文韶、山東巡撫丁寶楨）的對立。再者，大理寺少卿王家璧、

<sup>50</sup> 早在17世紀，琉球一方面向中國朝貢，一方面從屬於日本的薩摩藩，而呈現兩屬的狀態。日本明治維新後，雖然強迫琉球斷絕與清國的宗藩關係，但清廷未承認此舉，仍視琉球為藩屬國。見茂木敏夫，〈李鴻章の屬國支配觀〉，《中國—社會と文化》，2（東京，1987.6），頁89-99。

<sup>51</sup> 1873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到清國商談《友好條規》換約之際，順遣柳原前光探詢總理衙門對牡丹社事件的看法。當時清廷為推卸責任，遂以「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等理由，拒絕為該事件負責。明治政府則根據近代國際法的理論，主張一地區之主權，決定於是否能對該地進行有效之控制；既然清國未能控制臺灣土著，對土著無裁決權，則日本對臺灣土著的懲罰便未損害清國的司法權。根據此一理由，日本於是決定出兵征臺。在清日雙方對事件的論述中，恭親王雖強調清日關係應不受國際法限制，但卻無法反駁與對抗日本所強調的國際法之領土主權理論，反而給了日本出兵的藉口。牡丹社事件的衝擊下，清政府最顯著的反應，即是自1875年開始建設北洋海軍。關於牡丹社事件，見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頁375-376；茂木敏夫，〈清末における「中國」の創出と日本〉，《中國—社會と文化》，10（東京，1995.6），頁251-265等。

通政使于凌辰等保守派，亦提出反對購買與製造船艦的意見。自此，從 1874 年至 1875 年的北京官界，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局勢，不僅在國防問題上產生了塞防論和海防論的對立，而且在導入西洋機器的問題上，又形成了洋務派和保守派的對立<sup>52</sup>。在這場論爭中，劉錫鴻在給郭嵩燾、李鴻章、丁日昌的信函<sup>53</sup>中，以對「六條辦法」與「丁日昌六條」進行評論的形式，提出了有關清國和西洋現狀的見解。以下，本文將以這些書翰與在前往英國旅途中所撰寫的日記<sup>54</sup>為線索，探討劉錫鴻在渡歐前的政治思想之梗概與其對西洋的認知框架。

### （一）內政論

劉錫鴻出使前，對於內政方面，曾經提出幾項觀點：

自強者自立也，非謂當如外洋日以兵爲事自示強悍也。賞罰嚴明，用人得當，以立天下之綱紀，則人才自奮，吏治自修，民生自遂，財賦自裕，兵力自強，外夷亦自懼服，何事紛紛他求。<sup>55</sup>

國政具飭，人心克奮，其足摧勁敵不繫乎戰具也。<sup>56</sup>

自西洋各國以富強稱，論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謂其富強實由製造。於是慕西學者如蟻慕膾，建書院以藏機器，而以「格致」名之。……以從事吏治，其遽至貪侈昏惰，忍心害民者，十無二三。是以其時庶政就理，民生富庶，國勢亦以強焉。……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機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sup>57</sup>

要想排除外患、力圖自強，必須得人才、肅正官紀，否則即使導入了西洋的機器也未必能成功。換言之，劉認為與革除外患相比，安定民生恐怕更為重要，

<sup>52</sup> 最後（1875年5月30日）清廷決定海防、塞防並舉，以建立北洋海軍而期為海防的強化，並命以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謀求俄歸還所據的伊犁。至於保守派的反對論，則因「與諸議均相隔閼」、「任意詆斥在大臣之處，殊非議事之題，應請毋庸置議」等原因，反被嚴厲批判。有關塞海防之爭，見茂木敏夫，〈中華世界の「近代」的變容—清末の邊境支配〉，收於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271-276等。

<sup>53</sup> 例如：〈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兩生中丞書〉、〈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等。收於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頁272-277,277-283,301。有關這些信函，張宇權指出，是研究同時期以劉錫鴻為代表的晚清人士保守思想的重要史料。見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46。

<sup>54</sup> 赴英途中（1876年12月3日-77年1月21日）所寫的日記有〈新嘉坡〉、〈紅海道中〉等十七項。收於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頁47-69。

<sup>55</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300。

<sup>56</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兩生中丞書〉，頁277。

<sup>57</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格致書院後〉，50-51。1876年11月25日，他參觀了上海格致書院。見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始論鐵路〉，頁49。

且當時之要務亦非海防，反而是修明政治、整頓綱紀<sup>58</sup>。這個理論的前提，是基於「安定民心則能禦夷」所提出的傳統政治觀點，也是政治之根本，即以爲政者的修養與德治爲基礎的「人治」思想。這也就是說，劉錫鴻從重視內政和重視政治中人的因素的傳統立場出發，批判了以技術導入爲核心的自強政策。就其內在思路而言，劉錫鴻似乎認爲外政與內政之間並非並列之關係，外政應該從屬於內政。因此，在劉氏的自強論中，不斷強調內政統治重於強化海防，而改革弊政則爲其主要重點。

劉錫鴻的改革論，不僅全面地涉及軍事、用人和理財等內政事務，其中有用人部分，又以肅正官紀與用人得當，尤爲重要。按照他的主張，士大夫應該是道德的典範<sup>59</sup>，其任務是保護與教化庶民<sup>60</sup>。不過，根據劉錫鴻指出，當時的士大夫卻是落入了八股文的舊套，僅僅一味地模仿八股文，這與各類工匠以及玩弄奇思妙想的商人沒有什麼兩樣<sup>61</sup>。因此，倘要拯救當時之積弱，則應將重點放在革新吏治上，而端正士人之身心乃是先決條件<sup>62</sup>。另外，爲了求得人才，尚必須停止捐納（賣官鬻爵）、減少保舉。此外，劉錫鴻也強調，在求得優秀人才的同時，還必須嚴明賞罰、裁汰冗官、防止浮收和賄賂等官僚腐敗之情事<sup>63</sup>。

<sup>58</sup> 另外有「而賞罰嚴明又有以激發文武吏之氣，夫何慮英夷難制哉」等記載。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兩生中丞書〉，頁282。

<sup>59</sup> 如劉錫鴻云：「原夫士之所以可貴而置諸民上者，謂其志行之超越庸俗也」。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格致書院後〉，頁50。

<sup>60</sup> 如劉錫鴻云：「至朝廷設官，原以保衛百姓，黜枉伸直，禁暴安良，皆保衛中事，特不如洋人私護其衆，不問是非可否，一味徇庇已耳」。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6。

<sup>61</sup> 如劉錫鴻云：「竟致應舉之人，不必誦習經史語錄，不必講求學問經濟之理，而惟取時文之習套，略觀而摹倣之，即可自謂文士。夫今之讀書，雕摩搏埴之百工也。今之仕宦，操奇計贏之商賈也。以百工商賈之行，而為臨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格致書院後〉，頁51。

<sup>62</sup> 如劉錫鴻云：「故欲拯今日之貧弱，當由飭吏治始。飭吏治，當由端士習始。端士習，當由審議明道始」。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格致書院後〉，頁51。又如：「中國空虛不在無船無炮，而在無人無財，此皆政教之過也，政教既失，豈惟外洋之足患哉。夫士習之壞，向第陰背夫義以從利耳，今則顯然逐利，並不知有義之名。民風之壞，向第尚力而未能重德耳，今則長幼無序，且並不知有貴賤之分」。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0。

<sup>63</sup> 如劉錫鴻云：「此無他，賞罰嚴明，人爭愧勵，斯事自治，國自強，威靈自遠耳」、「夫國勢強弱在政事，政事治忽在人才。人之竭才與否，朝廷不能盡必也，而有所以驅之，使不敢不竭其才，不肯不竭其才者，則惟賞之與罰，獨奈何鴻毛輕之耶？」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頁272,274。又如：「誠能汰冗員，（註：以有用之財養此不必多用之員，即府庫充裕亦覺可惜，況今所收稅釐皆吾民脂膏，而捐輸捐納等銀又皆傷國血脈，不得已而姑取者也，奈何浪擲之以飼眾饑乎）。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兩生中丞書〉，頁281。又如：「今之濫保舉，如子弟喜交遊，日

然而問題正出現在此，即使劉錫鴻不斷地意識到科舉（八股取士）的弊害，但他卻反對李鴻章所提倡的設洋學局、另開洋務取士的途徑；同時，也未觸及全面廢止科舉制度的議題。換言之，他只不過著眼於停止捐納和削減保舉而已，這究竟能否算是一種爲了維持舊秩序的保守、反動思想呢？關於八股文的弊害，早在清道光年間包世臣、龔自珍便已經指出，其後重視實務的洋務派亦再三論及。不過，巧合的是，洋務派中竟也無一人主張全面廢止八股取士<sup>64</sup>。這種現象或許意味著，雖然知識分子努力嘗試擺脫科舉制度，但並沒有完全從中擺脫。有鑒於此，或許不能據以推論劉錫鴻的主張是保守、反動的。毋寧說，在此可以注意到的是，在當時的統治階層中，無論是洋務派或保守派，均有一個共同的態度，即承認科舉制度的弊害，並力圖尋找某種對策加以解決。

其次，有關劉錫鴻的理財策略方面，劉氏鑒於國庫的狀況日益惡化，於是將理財的重點放在緊縮財政，反對洋務派李鴻章等所提出的開採煤、鐵各礦與試辦招商輪船等開源之案<sup>65</sup>。正如劉錫鴻提到的，如在太平盛世，吏治清明，政教嚴明。民知於勵農，知節儉。勵農則物產豐，則物價低；商賈依據他人所生產之物，而簸弄之，以誘致人財者<sup>66</sup>所示，劉的理財策略呈現了很強的觀念論色彩，以農業爲「本」、將工商視爲「末」的農本主義，構成了其理論基礎。然而，環顧當時經濟問題之本質，或許問題根本出在道光年間以來的戶口劇增與白銀外流（銀價昂貴）。倘若以當時的經濟發展趨勢來看，則似乎又是以門口洞開等問題爲主因，且經濟發展已漸由農而工商，呈現商業化之跡象。因此，單憑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究竟能不能解決清國所面對的財政問題？就這一點而言，劉錫鴻的觀點顯然存在著有待進一步商榷之處。但值得注意的是，劉錫鴻卻也同時主張，

---

引朋類會食其家，初不計父兄之膳飲無自供也。傷哉」、「夫處今日而言富國，則惟停減成捐輸」、「（停止捐納、減捐）行之一年後，浮議自必停息，宦途士類廓然清明，由是而不彰政教，振興紀綱，成效旦夕可觀矣」。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86, 291等。特別是，有關汰冗員與廢捐輸的主張，不勝枚舉，可見劉錫鴻對時弊有深刻的危機感。

<sup>64</sup> 在塞海防之爭，總理衙門決定將李鴻章上開設洋學局之奏摺擱置下來。參閱大谷敏夫，〈清末經世思想の二大潮流〉，收於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舍出版，1995），頁119-156。

<sup>65</sup> 如劉錫鴻云：「財源已無可開，能節財流，即是富國第一善策。……故今日之事，於振作人才整飭綱紀而外，固當以充實帑藏爲第一要義，然求帑藏之充實，亦只宜節用以儲財，萬不可於財源設想」。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85。

<sup>66</sup> 如劉錫鴻云：「承平之世，吏治修，政教明，民皆務本知儉，務本則生物多而物賤矣，知儉則耗物少而物愈賤矣，物賤而人之嗜慾不侈，則衣食日用所費無幾，而財之留有餘者，遂以積而漸多，則富足所由致也」、「商賈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誘致人財者也」。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兩生中丞書〉，頁282。

若是為開源而增稅，平民便不堪其重擔，將導致民心的渙散<sup>67</sup>。其理由是當時的農民必須兌銀繳稅（折色）、以穀換錢，所以農民受銀價昂貴之禍最甚。倘若當時再增稅，亦只會逼迫著窮困的小民鋌而走險，終究將導致社會的動亂。清朝統治的後期的歷史發展，也證實了劉氏所言不虛。由此可說，劉錫鴻雖一味著意於民心的安定，但是他無法掌握白銀外流造成經濟問題的本質。此外，劉錫鴻雖未提出有效理財的具體方案，然而他卻已經意識到重稅與作亂的因果關係與官逼民反的可能性。

## （二）對外認識

劉錫鴻雖然從徐繼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著作中，得到有關歐洲諸國的知識，但其獲得的資訊仍然受到限制。他對當時西歐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現狀的瞭解，也只是一些不完全的認識而已<sup>68</sup>。雖然澳門的葡萄牙商人與廣東的英國商人亦會帶來西洋的資訊，但是對於透過商業活動所帶來的資訊，官僚和有識之士向來極少留意<sup>69</sup>。這也是劉錫鴻以傳統的華夷思想來順推、理解西洋諸國的一個原因。

自古馭夷之道，羈縻勿絕，雖英哲之君，值隆平之世，亦不出此。蓋天子體天以覆育天下，華夷罔非其民，能免民於兵燹，雖屈己亦且為之。<sup>70</sup>

錫鴻愚以為西洋之事當以和為主，以守輔和，而戒與輕戰。臨時守禦之策已於所錄日割布臆不再贅外，現惟以聖人柔遠之道待之，體其然諾不苟之性，恤其受欺

<sup>67</sup> 如劉錫鴻云：「蓋欲開財源，則必為增稅款加賦額之計，事事足以擾民，而渙散其心」。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85。

<sup>68</sup> 如劉錫鴻云：「此皆據總理衙門所刻之瀛寰志略為言，非得諸傳聞也」。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丞書〉，頁277。又如：「十九日，至埃及國境（洋人譯曰埃及國，瀛寰志略則曰麥西）」。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紅海道中〉，頁60。由此，劉錫鴻透過《瀛寰志略》得到了瞭解西洋的資訊、知識，是無庸置疑的。另外，初至英國之際，郭嵩燾攜帶《瀛寰志略》作為遊歐的參考手冊。見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頁167。此外，從先秦以來，「嚴華夷之辨」就是中國古人固守不破的信念之一。由「處天之中」的自豪帶來對蠻夷的鄙視，也使得中國古人的經世觀念從來就沒有脫離自我中心的軌道。然而面對列強炮火的威脅情勢，晚清士人則開始認真地將「夷務」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這當中，福建巡撫徐繼畲為瞭解「夷情」而撰寫《瀛寰志略》，試圖讓人們透過瞭解地理來認識世界。有興趣者，可參見大谷敏夫，〈海國圖志と瀛寰志略—中國近代における最初の開明地理書〉，《鹿大史學》，27（鹿兒島，1979.12），頁1-30。

<sup>69</sup>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における「アジアとヨーロッパ」〉，收於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頁228-229。

<sup>70</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頁275。

奸民愚直躁急之情，明白開諭以禁約其非，平心察處以解釋其怨。<sup>71</sup>

遣使只宜言通好，（註：通好不便於久駐<sup>72</sup>，則或令使臣訪求其人之通曉正音者與之講明聖教，俾相傳習，亦足推廣王化，潛消其強悍之心，他如圖其山川，紀其風俗，察其人才，皆使臣所當，有事可藉以久駐）。<sup>73</sup>

夫洋人固猶是人，可以情理喻者也。（註：能視之如中國尋常人，平心定氣以與相接，則無堅不破矣）。<sup>74</sup>

以洋人重信，不如中國人狡詐，得錢則渝約也。<sup>75</sup>

由此可見，劉錫鴻對待西洋諸國的基本態度是「羈縻」、「王化」，以天子之德進行教化。總之，劉錫鴻以傳統的理念（亦即，上對下的霸權式觀念）為基礎，將清國與西歐各國的關係定位在「華／夷」模式中。然而，與徐繼畲的種族歧視<sup>76</sup>相比，劉錫鴻對於「夷人」的評價則是相當善意的，亦摒棄了倭仁西洋觀中隨處可見的強烈的敵意和猜疑<sup>77</sup>。因此，他藉由停泊在英領地以及遊歷處於英國勢力下各地的機會，觀察那裡的事物，與其借用手代木有兒的觀點，

<sup>71</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頁276。

<sup>72</sup>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深感南京條約並未促成清國全面開放通商，其後修約時，遂以貿易範圍擴及全中國、北京設置使節、降低關稅、鴉片合法化為要求欲與清國重定新約。其中，派遣駐清國北京使節一項，向為清國拒絕（當時唯一例外、派遣使節駐清者為俄國）。英國在要求駐節與修約不遂的情況下，終於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拒絕外國派遣使節進駐北京城、不讓使節見皇帝，是清國對待外國的基本國策。北京駐節相當於否認封貢體系、天下共主的觀念。此態度，深深影響清國的官員、知識分子，影響清國對於外國駐節與對外派遣使節的政策。劉錫鴻的態度，正好可以反應此點。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文化，2002），頁133-135,182-199,221-224。

<sup>73</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8。

<sup>74</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88。

<sup>75</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2。

<sup>76</sup> 依據坂元ひろ子的研究，有關《瀛寰志略》一書，值得注意的是由西洋「輸入」對黑人的歧視意識。如：「黑蕃愚昧，長久如此未開」、「混沌無知，相近禽獸」、「容貌黑醜，如同豕鹿無知」等等，他的種族歧視達到「非人化」的階段。關於《瀛寰志略》中的種族觀，見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思想》，849，頁61-84。

<sup>77</sup> 發生同文館論爭（1866-67）之際，倭仁用「機心最重，狡詐多端」、「吾仇」、「詭譎」、「醜類」、「詭謀」、「桀驁」等語形容英人，可見惡語傷人之態。雷俊玲認為，劉錫鴻和當時其他清國人一樣，對於英國兩次把戰爭加在清國頭上，憤恨和屈辱均感刻骨銘心。但代表當時保守人士的倭仁與劉錫鴻對英人的評價，卻是如此迥異。過去的研究，往往以保守派是一個黨派，簡單而籠統地討論其共同性、整體性。顯然地，保守派內部的差異著實不少，絕不亞於其共性。見伊藤桃子，〈清末における對外認識の諸相—倭仁と劉錫鴻の西洋觀を中心として〉（筑波：國立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44-49；倭仁，〈奏陳學習西洋天文數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學士為害甚大〉，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2（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75-76。

概括來說，劉錫鴻對西洋的否定性認識開始改變了<sup>78</sup>；倒不如應該說，航海前對西洋已有的「矛盾情緒」(ambivalent)之評價—即對洋人的鄙視(夷狄觀)與肯定，透過在停泊地的觀察變得更加肯定了。另外，對西洋人抱持肯定性的評價，就這一點而言，可以推想，劉錫鴻可能是受了《瀛寰志略》中對洋人予以「聰明闊達」評價的影響<sup>79</sup>。

劉錫鴻還主張，必需仿效稅務司(外國監督制)<sup>80</sup>，在各省建立洋務司(正副兩名)，以洋人之有才而能習正音者充當，專管調查、報告西洋諸國的內情與調停外交案件<sup>81</sup>。關於洋務司的待遇，劉氏認為應給予豐俸而限制其位階。在任用方面，則先試用一年，試用期滿得委任實職；在正式任用後，三年俸滿成績卓著者，得延長其任期<sup>82</sup>。讓西洋人從事交涉和收集資訊的主張，是否為洋務派經常用之「以夷制夷」政策的延續，從他的相關論述來看，仍不明確。然而，對於西洋人並不那麼反感，且關注西洋人的實務能力這一點，確實顯示了他不同於保守派的現實主義的一面，頗富意義<sup>83</sup>。

<sup>78</sup> 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2)—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8-1，頁95。

<sup>79</sup> 坂元ひろ子指出，徐繼畲在《瀛寰志略》中，將向來視為夷狄的歐洲人(日爾曼民族)置於中華同等的地位。這樣的傾向，普遍可在薛福成等，身為外交使節而赴歐洲的官員身上。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思想》，849，頁64。

<sup>80</sup> 1854年，因小刀會佔據上海，海關被迫停止工作，上海道台吳健彰和英、美、法三國領事，藉此以再開徵關稅為目的，設置了外國監督制。制度的中心是，由英、美、法三國領事各提一名的稅務司，組成的稅務管理委員會，任命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為首任總稅務司。過去深為漏稅所困擾的英國，在新制度設立後，終於使財稅徵收正常化，也增加了清國的財稅收入。簽訂天津條約後，海關的外國監督制統一擴及於每一通商口岸，並將總稅務司隸屬於總理衙門之管轄。1865年以後，總稅務司更成為清國的政治顧問，頗具有影響力，清廷甚至所給予尚書、太子太保等名譽銜。見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頁232-233,266-267。

<sup>81</sup> 如劉錫鴻云：「倣稅務司而推廣之，各省似不妨增設洋務司正副兩員，以洋人之有才而能習正音者充當，專管探報洋情，調處中外交涉事件，隨時刊布中外」。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7。

<sup>82</sup> 如劉錫鴻云：「卑其品級，而厚其祿養，試用一年可用，然後實授，給以全俸(註：試用只給半俸)。三年俸滿有功，然後再留。留任有大功，則以銀幣重賞之」。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7-298。

<sup>83</sup> 至於設立外國監督制，雷俊玲據〈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的記載，論析如下：劉錫鴻認為「朝廷官員與洋人接觸有傷國體，不如倣稅務司而推廣之」，「他以為儘可能不與洋人，就不會使官威受損，這種想法實在是非常被動保守的駝鳥心態」。但是，劉錫鴻另一方面也寫道：「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誠以信，坦懷相示。彼而有求於我也，其可者寬予之，其不可者則以情理曉譬之，總期正大詳明，無所詭託，無所閃避，尤不可為權時應付之語」。劉錫鴻的主張，也許可說是鑒於當時的官界風氣(官人與洋人相見被視為一件羞恥的事)所提出來的、用心良苦之策。另外在劉錫鴻的言說中，值得一提的是，他陳述外國監督制是康熙之初已有的先例。將外國監督制比作欽天監，這種思維方式，與小野川秀美所提的「附

在洋務司一事的主張上，應該注意到的是，劉錫鴻曾論及，洋務司一職，以美國人最為適合。因為美國重知識、講道理，沒有以力量爭勝敗，且其強盛之處亦為英人所畏懼，適可利用美國之力量以牽制英人<sup>84</sup>。根據佐藤慎一的論點，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的近四十年中，晚清士人一方面透過「附會說」與「中體西用論」的操作，以防華夷世界觀的崩潰；另一方面，又透過三種模式來瞭解清國與西方諸國間的多元關係<sup>85</sup>。佐藤認為三種模式中，最重要的即是「勢均力敵」（均勢）模式。因西方諸國以擴張勢力為目標，唯恐其他國家勢力的擴大，使自己國家的地位相對下降，故國家之間形成了「合縱連橫」的格局。清國可以透過「合縱連橫」的策略，維持各國保持均勢，從而達到清國與各國的關係，以及各國彼此之間的相對安定。透過這種方法來掌握西洋的國際秩序，用競爭的觀點來理解國際秩序，在勢力平衡中尋求諸國間的安定因素，此即均勢模式。按此論點，似乎可以認為劉錫鴻是根據均勢的模式來理解西洋諸國間，以及清與諸國間的互動關係，而不僅限於傳統的「以夷制夷」策略。例如，「美國不角力」、「可藉美人制英人」等觀點，就是以各國追求自身利益而相互競爭的國際關係為前提所做出的結論。可以看出，劉錫鴻確實是用「競爭」的觀點來理解國際秩序，在以夷制夷基礎上，更進一步地尋求西方各國在清國的均勢。然而，劉錫鴻卻似乎並未在國際外交關係中，將清國也看作是均勢模式中的一員。正如其所言，今日之西夷遠在重洋彼岸，不可能越過數萬里來吞併中國<sup>86</sup>；劉錫鴻似乎認為，即便應該考慮將清國視為均勢模式中的一員，但遠在歐洲的勢力均衡，卻似乎是與清國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重要的是，各國

---

會說」似乎有若干相似之處。見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88,298；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210；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頁12-50。

<sup>84</sup> 劉錫鴻云：「洋務司正副兩員當以美利堅國人充當，蓋此時美國尚知言理而不角力，且其強盛又為英人所畏，可借之以制英人也」。就劉錫鴻對美國人予以較高的評價而言，可以說天津條約續增條款（蒲安臣條約：1868）事件是重要的背景。該條約有許多保護在美華人的規定，如禁止苦力貿易、保障信仰之自由、居住權及教育權之雙面最惠國條款等，且關於電報線和鐵路方面，寫道：「美國無干預之權，總由中國自主」。從1868年起，列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時與中國訂立的各條約先後期滿而需修約，列強紛紛藉此企圖透過修改條約來取得新的權益。在此情況下，劉錫鴻產生「美國尚知言理」的看法，應無疑義。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7。

<sup>85</sup> 佐藤慎一指出，清國在自強運動時期，為瞭解國家間的多元關係所採用的認知架構，大致可歸納三項：（1）「均勢力敵」模式；（2）「萬國公法」模式；（3）「商戰」模式。見佐藤慎一，〈儒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國—社會と文化》，4，頁34-54。關於「中體西用論」，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頁12-50。

<sup>86</sup> 如劉錫鴻云：「今西夷遠隔重洋，勢不能跨越數萬里并有華夏」。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頁275。

之間的擴張、利益糾葛等，一旦涉及清國，務盡力使其保持均勢狀態，藉以維持清國的相對安定與利益。

劉錫鴻認為對於西洋諸國，應避免使用武力，採取和平的態度，因此以防衛作為基礎的對外政策極為重要<sup>87</sup>。在重視防衛這一點上，他與倭仁等的主張相近<sup>88</sup>。至於防衛的內容，倭仁沒有深入討論，但是劉錫鴻提出了三項具體的政策<sup>89</sup>。其一是在天津至北京的途中設置重重防衛，亦即期為強化首都防衛<sup>90</sup>。雖然強化首都防衛的主張，在同治年間就已經由左宗棠提出，劉氏的主張並無太大的新意<sup>91</sup>。但應該注意的是，左氏的防衛論是以建造輪船、海軍為基礎，而劉錫鴻則是以設置砲台為基礎<sup>92</sup>。劉錫鴻前往英國的旅程中（1876），曾在新加坡、馬爾他、直布羅陀等英領地靠泊，當時他之所以熱衷於參觀砲台，正是出於其防衛論首重砲台的背景<sup>93</sup>。並且，劉錫鴻所建構的防衛論，是根據自己以樂觀的形勢所估計的結果，也就是劉錫鴻認為西方各國東來雖具有威脅性，然其目的實為通商，並無領土上的野心。如劉錫鴻提到：「英、美諸國每遣使中

<sup>87</sup> 如劉錫鴻云：「愚以為西洋之事當以和為主，以守輔和，而戒與輕戰」。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頁276-277。

<sup>88</sup> 伊藤桃子，〈清末における對外認識の諸相—倭仁と劉錫鴻の西洋觀を中心として〉，頁46-47。

<sup>89</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5-296。

<sup>90</sup> 如劉錫鴻云：「專就戰守而論，先事之謀有三焉：……一則由天津海口至京之路，宜設重險以衛根本」。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5。

<sup>91</sup>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摺〉云：「況我國建都於燕京，天津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颺舉，無足當之。……臣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收於楊家駱（編），《自強運動文獻彙編》，5（台北：世界書局，1963），頁5-6。

<sup>92</sup> 如劉錫鴻云：「大沽而外，如郡城東南之北塘、郝家沽，城北之楊青、三岔河、西沽，東北之劉快莊，西北之楊柳青、三角淀等處，皆可相地預築土砲台，以便臨時加築陸營，相輔守禦」、「今商人自製輪船之說，鴻意頗不謂然。輪船一具，洋人製之少者須三十萬金。中國製之亦須七八萬金。……以附洋人船而失，洋官能為之追賠，附中國船而失，中國官不能為之追賠故也。夫製船而人無附之者，其利安在？人亦安肯自為製乎？……國家果有餘財，則購洋輪船而擇將領之」。由上可知，劉錫鴻並非以盲目排外的心態，反對導入西洋機器。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92,295。

<sup>93</sup> 劉錫鴻在新加坡、亞丁、馬爾他、直布羅陀參觀了砲台，其記載均頗為詳細。停泊於馬爾他港時，他甚至主動向當地的總督要求參觀砲台。赴英後也曾前後數次參觀英國製砲廠，對英人研發、製造火器與精心審驗的精神，深感佩服。由此可謂，自從赴歐以來，他對砲台的興趣甚濃。依溝口雄三等學者研究，劉錫鴻回國後（1879），上奏〈訪求築造砲台模式摺〉與〈築造砲台未盡事宜書附〉兩摺，提出築造砲台之建議，各省砲台的建設也採用了他的築造法，此即赴歐經驗的成果。見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277；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191-95。

土，必牒以毋擅動兵，此可見其無狼吞虎噬之志」<sup>94</sup>，然「彼人意在商販，必不好與我構難。」<sup>95</sup>

既然西洋各國雖具威脅卻沒有領土野心，而志在通商，劉錫鴻於是建議，清國的政策便應以商業利益來籠絡侵略者，透過物質引誘以控制他們。劉錫鴻的觀點顯然過份的樂觀，但這樣的觀點，不外乎是承襲長久以來的羈縻政策，曾國藩、郭嵩燾等許多洋務派亦抱持相似的觀點<sup>96</sup>，可以說相當值得注意。

其次，劉錫鴻對當時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國－之殖民地統治，究竟持有什麼樣的認識呢？關於英屬錫蘭（Ceylon），他寫道：

土著長髮面黑，不衣履，腰以下系花布，與檳榔嶼等處同。……宴之先，遣土官得西拉瓦，以馬車導客游觀。……蓬寮木屋，疏布林間，類皆栖止貧民。有臥佛寺兩，殿宇狹隘，僅足旋踵。畫壁羅漢及所繪故事，工皆粗陋，不堪入目，亦無堂廡可以延客。<sup>97</sup>

英人以此地（錫蘭）為西南洋沖要，姑薄其稅，招徠商賈，冀為大埠，以供其往來困乏之需。迄今惟錫蘭海面，巨艦尚不甚多；其三埠，則帆檣雲屬，初不遠遜香港。然設兵均止二、三百名，如錫蘭幅員之廣，亦只四百名。蓋其（英國）立國意在四出占踞埠頭以圖富，而又不願分駐多兵，耗費餉糈。故苦心孤詣，創為輪船、電報，俾其往返迅速，以省兵力，營謀亦盡善矣。<sup>98</sup>

在此，劉錫鴻主要的關懷是著眼於英國的統治技術，對殖民主義的負面內涵與效應，並沒有抱持批判態度。他雖意識到被殖民者的貧困，但有關殖民主義的暴力性與差別統治、不平等權力的本質等，則未提及。正如「土官」一詞所示，劉錫鴻顯然是站於英國、殖民者的這一邊來看待其統治；進一步來說，即是用清國「土司制度」<sup>99</sup>此一傳統統治少數民族的政策，來瞭解英國與錫蘭

<sup>94</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頁287-288。

<sup>95</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復李伯相書乙亥六月二十七日〉，頁276-277。

<sup>96</sup> 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1800-1911（下）》（台北：南天書局，1987），頁174-178。

<sup>97</sup> 劉錫鴻於1876年12月21日夜抵達錫蘭。參見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錫蘭〉，頁56-57；〈馬拉甲途中〉，頁56。

<sup>98</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人經營南洋〉，頁57-58。

<sup>99</sup> 所謂「土司制度」溯源於唐代，清代的土司制度基本上是承繼明代，屬於六部（吏部、兵部）的管轄。清代土司的分布，有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甘肅、青海、西藏七個地區。土司所管轄的區域，在地域上，雖然位於漢族居住地區的十八省內，但該地在民族構成上卻是以非漢族佔大多數，故為清朝認可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治。清雍正朝以後，以漢族的移住為背景，逐漸修正土司制度、推行改土歸流，一度導致苗族的叛亂。據清乾隆年間的統計，清廷所任命的土官，文職土官112名、武職土官596名，共708名。其中雲南、貴州與四川三地區佔七成以上。參閱片岡一忠，《清朝新疆統治研究》（東京：雄山閣出版，1991），頁25-26,36等。

的關係，進而合理化英國的殖民統治。

最後一提的是，劉錫鴻在赴英前的書信和航行過程中的日記，對於清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洋進行直接對照、比較的，只有以下的部分。

洋人之商賈與聞政，官商相保衛，資商力以養兵，非其法較中國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謂國主，無異鄉里中之首事。所謂官，無異鄉里中之富室大家。國主由公眾舉（註：公舉公廢，本族無堪舉者則求諸他族，本國無堪舉者則求諸他國，均集眾議明辦理），畀以一定分祿，承辦一國之事，而不能專斷其事，遇事則集富室大家，及一國之眾而公議之。（註：議事院即鄉約公所之類，國主亦親就其地以聽眾議）議既成，按貧富各出財力同為辦理，此則其國主官商之體制。……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尊卑貴賤體制殊嚴，士農工商品流各別。渙汗頒而八方罔不承聽，矧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是，鈇鉞而諸侯始得專征，矧其在市儈之賤何得擅蓄甲兵。至朝廷設官，原以保衛百姓，黜枉伸直，禁暴安良，皆保衛中事，特不如洋人私護其眾，不問是非可否，一味徇庇已耳，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也。<sup>100</sup>

文中，劉錫鴻援引「首事」<sup>101</sup>、「鄉約公所」等中國傳統的地方鄉治制度，藉以理解西洋的近代政治制度。姑且不論英國王「由公眾舉」且給予俸祿在事實上的認識錯誤（可能與首相混淆，或想像著美國總統制的情況而下判斷），此處需要注意的是，他不是將西洋諸國的最高權力者國王比作清國至高存在的天子、皇帝，而是比作鄉里首事。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的最高權力者，擁有皇帝和天子兩個頭銜，受天命君臨世俗世界的統治者是皇帝，象徵天之權威的祭祀者為天子<sup>102</sup>。這意味著，理論上皇帝的即位與退位，被視為由「天」決定，而不是由「人」決定的。劉將西洋國王比作透過地方公舉所選出的「首事」，正是這種傳統意識強烈作用的結果。國王由民之眾議來決定，在儒家的禮教思想中是無法被接受的。正如「富室大家及一國之眾」參與政治的「國王官商之體制」，劉錫鴻便明言此為「夷狄之道」。換言之，劉錫鴻便是依據庶人參與國政的標準，視西洋諸國為「蠻夷」。這是劉錫鴻出國前與旅程中，對於如何認識西洋諸國、如何區辨

<sup>100</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296。引用時，省略了自註的一部份。

<sup>101</sup> 又稱會首、會頭、首事人等。鄉治是以五、六名，或數十名首事組成，其中一名被推選、任命為鄉長。首事基本上是一個名譽職，原則上不支領政府的薪水，並透過舉薦的方式選出。參見：福武直，《福武直著作集：中國農村社會の構造》，9（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頁409-410。

<sup>102</sup> 村田雄二郎，〈中國皇帝と天皇——一つの比較視座〉，收於山内昌之、増田一夫、村田雄二郎（編），《帝國とは何か》（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117。

「華／夷」，最重要的觀念與標準。

## 肆、駐歐時期（1877-78）之西洋觀—以駐英副公使期為中心

清國首次正式遣使駐外，除了正使郭嵩燾與副使劉錫鴻外，還有三等參贊官黎庶昌、三等翻譯官張德彝、鳳儀、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隨員李荊門、劉孚翊，隨員兼翻譯官張斯杓，辦理支應官姚獄望，監印官黃宗憲，武弁郭斌、羅雲翰、周長清、紀端、賀志斌、龔紹勤計六名官員，以及駐清英國官員禧在明（W. C. Hilliet, 1849-1927）組成。1876年12月2日乘英國郵船搭拉萬閣（Travancore）號從上海出發，翌年1月21日抵達倫敦。駐英使節的任務，則是為馬嘉理事件（1875）致歉、在倫敦設立使館，並向總理衙門報告西歐情況。尤其是蒐集有關西方資料方面，自1866年的斌椿使團以來，是此次遣使最重要的任務，而與英國政府進行外交交涉則僅是使團的次要任務。按照清總理衙門規定，遣使必須將任內的所見所聞摘成日記，三年任期屆滿歸國時，須將日記呈交皇帝閱覽。此外，總署亦建議出使各臣，凡有關交涉事件與各國風土人情，當詳細記載，隨時咨報。自1866年至1900年，各使臣撰著外國記事者有61位，撰著記錄多達150種。當時，此類書籍更成為晚清士人認識外國、認識世界，頗具影響力的參考資料<sup>103</sup>。也因負有蒐集情資的責任，劉錫鴻抵英後，立即積極地致力於掌握英國國情，包括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等消息。根據學者佐佐木揚指出，劉錫鴻對於經濟問題與地方自治的興趣，顯然比郭嵩燾更為濃厚，其記載亦較為詳細。例如，劉錫鴻將英國地方自治制度比作「三老制」與「里老制」，並給予此一制度高度評價<sup>104</sup>。

主要在駐英期間（1877年1月21日-11月13日）所撰著的《英軺私記》中，劉錫鴻從〈開會堂情形〉談起，非常詳盡地介紹〈上下議政院〉、〈會堂議事情形〉等英國議會制度的運作情況，且深受矚目<sup>105</sup>。清末關於議會制度的介紹，在自強運動之前，已有魏源的《海國圖志》（1842）、徐繼畲《瀛寰志略》（1848）與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 Muirhead）《大英國志》（1856）等資料提及。根據學者的

<sup>103</sup> 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1)—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7.1，頁7-8；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頁182-183。

<sup>104</sup> 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頁163,165。

<sup>105</sup> 劉氏亦提及德國的議會制度，但其記載稍簡略。劉錫鴻（撰），《日耳曼紀事》，〈德國議政院〉，收於鍾叔河（主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6），頁223。

研究，魏源在《海國圖志》〈四洲志〉中，使用「巴里滿 (parliament)」、「律好司 (the House of Lords)」、「甘文好 (the House of Commons)」等音譯名稱介紹英國的議會制度，但實際上錯誤仍舊不少。不過，魏源在有關美國總統與美國議會制度的記載方面，似乎又較為正確、詳盡。另外，又有徐繼畲在《瀛寰志略》中使用「國會 (公會所)」、「上院 (爵房)」、「下院 (鄉紳房)」等簡潔詞語，敘述英國議會之構成與其權限。此外，又如慕維廉所著《大英國志》一書，是《英國史》(T. Milner, The History of England)的節譯，對於英國議會政治的發展論述相當正確<sup>106</sup>。其次，自強運動時期則有斌椿《乘槎筆記》(1866)、張德彝《航海術奇》(1866)、《歐米還遊記》(1868)、宜垕《初使泰西記》(1868)等著述。再者，自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報紙上亦逐漸能看到有關介紹或討論西歐議會制度的文章。例如，《申報》(1874年6月17日)上報導，俄、德兩國君主可以推翻議會的決定；但在英國，則是由人民推舉之下院掌握了政權<sup>107</sup>。又據佐佐木揚的研究指出，郭嵩燾入京後(1857-61)開始訂閱《申報》，駐英期間(1877-79)所寫的《郭嵩燾日記》中亦屢屢引用其記事，《申報》可謂是晚清人士瞭解內外情勢的重要資訊來源之一。由此推測，隨同郭嵩燾出使的劉錫鴻亦有閱讀《申報》的可能性<sup>108</sup>。另外，在上海出版的周刊《萬國公報》(1875年6月12日)，不僅論及西歐所實行的法治，更介紹了法治最關鍵的基礎，也就是行政(行權)、司法(掌律)、立法(議法)三權分立制度<sup>109</sup>。再則，光緒元(1875)年軍機大臣文祥，也早已密奏主張議會制度因天澤分嚴，在中國勢不可行，但其聽從民意的旨趣，則有所可觀<sup>110</sup>。由此看來，自強運動似乎很早就包含了對議會制的關注<sup>111</sup>，

<sup>106</sup> 佐佐木正哉，〈中國における共和思想の展開と臺灣民主國獨立運動始末(上)〉，《近代中國》，18(東京，1986)，頁105-108。

<sup>107</sup> 上海申報(編)，《申報》，9(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論創行議院事〉，同治十三年五月四日，5287。

<sup>108</sup> 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頁165-166。

<sup>109</sup>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29(台北：華文書局，1968)，〈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光緒元年五月九日，1083-85。有關美人傳教士林樂知(Allen, Young John)發行的《萬國公報》，依據李華興的研究指出，該報是最早為中國人介紹西洋的議會政治、天賦人權與三權分立思想的報刊，且《萬國公報》是將「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傳到中國的重要文獻。李華興，《中國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138-139。

<sup>110</sup> 「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見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清史稿·列傳·文祥》(台北：鼎文書局，1975-1981)，卷386，列傳173，頁11690。

<sup>111</sup> 溝口雄三，〈近代中國像の再検討〉，《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50。

劉錫鴻極為詳盡地介紹議會的形式及實際運作，也似乎與議會制度受晚清士人的青睞息息相關。

凡開會堂，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辯論之久，常自晝達夜，自夜達旦，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官政乖錯，則舍之以從紳民，故其處事恒力據上游，不稍假人以踐踏。而舉辦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蓋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sup>112</sup>

城鄉鎮埠，各舉議院紳一、二人，隨時以民情達諸官。遠商於外者，於倫敦立總商會，亦以議院紳主之，為上下樞紐。民之所欲，官或不以為便，則據事理相詰駁，必至眾情胥洽，然後見諸施行，是謂無隔閡之情。<sup>113</sup>

在此要指出的是，劉錫鴻雖然對英國議會的形式規制，包括上下院、議事、表決方式等進行詳細分析，但卻尚未觸及英國議會具有立法權。此外，劉錫鴻認為英國無上、下隔離之現象，實受惠於議會制度；但是，清國則因「迴避」等制度造成了官民的隔閡，而成為重要的內政問題。有鑑於此，部分官員主張應該廢止迴避制度，從當地選出鄉治人員而委以地方行政實務。根據村田雄二郎的研究指出，此即是「鄉治人員任用論」，一度盛行於明末清初而與傳統的「封建論」相互結合，雍正時期一度弱化成為政治禁忌<sup>114</sup>。此一地方「鄉治人員任用論」經道光年間的包世臣重新提出之後，又有以馮桂芬為首的眾多知識分子加以倡導，遂逐漸發展成改革科舉制度的訴求。這也就是說，在自強運動時期的官界，已經普遍意識到潛在的官、民分離問題。劉錫鴻相當關注議會制度能夠將下情及時傳達給為政者的功能，應當也意識到上述官、民分離的背景。另外，按照傳統政治思想，若上下隔絕，則民情不能上傳，民憤日積月累，其結果必招致民心背反，為政者將會失去天命。要之，「使上下之情通達」是作為實施善政之標準與佐證。傳統思想色彩極其濃厚的劉錫鴻，對英國的政治作出官民無隔閡的評價，意味著他似乎承認英國政治為「善治」<sup>115</sup>。但是，這個評價，其實只是儒家理想「上下通達，斟酌民意」的折射，並非對英國議會政治做出明確的價值認可。再者，劉

<sup>112</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開會堂情形〉，頁83。

<sup>113</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總論英國政俗〉，頁110。

<sup>114</sup> 村田雄二郎，〈王朝、國家、社會—近代中國の場合〉，收於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4（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頁52。同樣的意見，參見大谷敏夫，〈清朝君主權と士大夫〉，收於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480-504。

<sup>115</sup> 劉錫鴻對英國政俗的讚賞，寫道：「到倫敦兩月，細察其政俗，惟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全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此外則無閒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虐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總論英國政俗〉，頁109。

錫鴻亦注意到報紙輿論的力量，參觀戴晤士（泰晤士）報後指出，倫敦新聞紙，乃「清議所繫」<sup>116</sup>。總之，劉錫鴻認為報紙之目的，乃開放言路之所在，是使下民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可見他所關心是，應該如何與為何必須解決官民之間的隔閡。

英國維多利亞王朝中期的「黃金時代」(Pax Britannica, 1851-73)，以大英帝國博覽會為其起點，在該時期因修改《工廠法》(1867)與勞動工會的合法化(1871)等，致使勞動條件得到改善，同時也在城市環境的改善方面取得了進展。例如，劉錫鴻在《英軺私記》的〈倫敦〉、〈倫敦監獄〉、〈英國地方官之制〉等記事，都對英國的衛生環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117</sup>。此外，制定工人子弟教育義務化的《初等教育法》(1870)，亦擴大了受基礎教育的機會。其結果是，工人階層實際的平均收入增長了40% (1862-75)，識字率(1850-70)也由69%上升至80%。對於英國「黃金時代」的繁榮社會，劉錫鴻抱有如下的感想：

死而夭者多，則究其所以然之。故令醫生察勘其地，或攘剔其障蔽以通天氣，或疏浚其溝渠以通地氣，或糞除其道路以免疾疫。……人無業而貧者，不令沿街乞丐，設養濟院居之，日給饗餐，驅以除道造橋諸役。故人知畏勞就逸，轉致自勞而自賤，莫不奮發以事工商。國之致富，亦由於此。<sup>118</sup>

貧而無力就學者，則收之以義塾焉。都會鄉鎮各有義塾，自數所以至數十所，每所延師數人以至十數人，均按其地大小酌行之。……鄉官歲核戶籍，省知己屆五齡，即驅率入塾。初學教誦耶穌經，既長學書算勾股開方之法，是之謂小學。小學成，則令就工以謀食。其資稟特優者，益使習天文、機器、畫工、醫術、光學、化學、電學、氣學、力學諸技藝，是之謂大學。……夫喜逸而惡勞者，人之情也。難善而易惡者，人之習也。設學以訓子弟，人不志是，則姑聽之，未有皆馴然束身以就吾範者。英人慮此，特為官法督治之。……國之致富，蓋本於此。<sup>119</sup>

劉錫鴻觀察黃金時代的成就，由此得到了福利政策與教育制度實為西歐富強根源之結論。另一方面，劉氏又論述道：

<sup>116</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倫敦新聞紙〉，頁73。

<sup>117</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倫敦〉云：「道之廣者，可七、八車並馳，狹者亦可四、五車，皆潔淨無稍垢穢。……每游驛道上觀之，左右房舍峻整華潔，數百街如一式」，頁75；〈倫敦監獄〉云：「其獄則崇樓廣廈，遍繞回欄，壁淨階明，塵垢俱絕」，頁123；〈英國地方官之制〉云：「道路整潔，橋樑畢修」，頁159。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2)—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8.1（福島，1999.8），頁96,98等。

<sup>118</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養民之政〉，頁95。

<sup>119</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人講求教養〉，頁207-208。

足食、足兵，治國何嘗不務富強？但所以致富強者，准繩乎仁義之中，故其教為萬古所不能易，中國歷朝強盛由此。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順，重洋慕化，亦由於此。今英國知仁義為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奈何以為貽害也？<sup>120</sup>

中國自秦、漢以迄元、明，修其教（聖人之教）則治，淪其教則亂。其治也，遐荒向德，重洋慕化，仁義之風逐漸及於四裔。……今西洋之俗，以濟貧拯難為美舉，是即仁之一端；以仗義守信為要圖，是即義之一端。<sup>121</sup>

他認為，富強應是透過「仁義」方可實現，具備仁義的英國，已經達到了富強的境界。另外，從上述的主張中，可以看出「仁義＝聖教」這個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標準，劉氏已經轉化且默認了這一點。總之，劉錫鴻是轉化傳統的普遍價值觀，而對英國所實現的富強給予正面評價。他並且認為，「仁義」是一種形式上的抽象價值，並不具備現實之基礎。如此說來，似乎可以推測，劉錫鴻將福利、教育等制度，均視為抽象概念中「仁義」的現實化之物<sup>122</sup>。如此，劉錫鴻將價值判斷的標準，確立在儒家的傳統理念—「仁義」之上，從而讚賞英國政制。同時，劉氏亦將福利政策、教育制度，均視為「仁義」的一部分，而給予肯定的評價。

然而，誠如劉錫鴻論到，在中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儼然猶存，非甚不肖，猶知顧畏仁義，不敢過肆其桀驁；故剝擊屠戮，較之聖化未被之地，其慘忍終殊」<sup>123</sup>；反之英國與德國「惟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全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sup>124</sup>、「論家規則尊妻而卑夫，……論生育則重女而輕男」<sup>125</sup>、「西人不知有父母，或謂耶穌教為以天為宗，掃滅一切。凡為子者，自成人後，即各自謀生，不與父母相聞」<sup>126</sup>、「狎暱笑語，咸所不避，第不至於亂。有所犯，則其夫亦憤恚於心。故女子恒厭有夫之拘束，不如無夫之放蕩自得，以是終身不嫁

<sup>120</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與波斯藩王論強弱〉，頁141。

<sup>121</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電學有感〉，頁129。

<sup>122</sup> 有關仁義的內涵，劉錫鴻寫道：「聖人之教，仁義而已。仁者，人心固有之純善。……而其（仁義之道）大用，則維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聖人慮人之違其教也，佐之以兵刑。兵刑者，不得已然後用之，所以不驅不仁、不義之人咸歸於仁義，而非以逞忿、非以恃強者也，故兵刑亦仁義也」。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電學有感〉，頁128-129。

<sup>123</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電學有感〉，頁129。

<sup>124</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總論英國政俗〉，頁109。

<sup>125</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國民數〉，頁205。

<sup>126</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男女婚配〉，頁182。

者比比」<sup>127</sup>。由這些論述來看，他並非因中國尚未實現這些社會福利政策與教育制度，便承認英國具有優勢地位。反而，如上所示，藉由西歐國家觀念上、民俗上、文化上的差異，擴解解釋為五倫尚未完備的例證，嘗試論證華夏文化的優勢。由此可知，劉錫鴻將華夷之辨建立在有無「五倫」的基礎上，因此得以保有作為「華夏」的矜持<sup>128</sup>。

至於英國民風，劉錫鴻再如下寫道：

向疑英人僻處海島，惟知逞強，無敬讓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禮自處，顧全國事如此。<sup>129</sup>

今兩使者出門，百姓夾道歡呼，男摘冠、女搖巾以為禮，可知英人一意敬愛賢能，不分疆界。<sup>130</sup>

余在京師，即聞英倫有播犁地士母席庵（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館）者，大書院也，各國之書畢備，到此後急欲一往觀之。……每禮拜一、三、五等日，放門縱令百姓男女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sup>131</sup>

倫敦人最喜行善。老幼、孤窮、廢疾、異方難民，皆建大房院居之，優給其養。<sup>132</sup>英人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于此。<sup>133</sup>

歐遊前，劉錫鴻雖並非如同當時保守人士，在盲目排外的心態中，只知一味詬罵洋人，但他也尚未能完全擺脫將洋人視為「夷狄」的傳統認知框架。然而，劉錫鴻在直接接觸英國人民以後，他發現英人對中國遣使多半持友好態度的同時，認為他們知禮，講求教養，力求善舉。其中，對商賈的看法變化為大，劉氏出國前斥商賈為「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致誘人財者也」<sup>134</sup>的態度，與出使後，將之視為國家致富的基礎，實大相逕庭。如此可知，劉錫鴻透過在英國所見所聞的經驗，似乎已經修正了原有的「洋夷」偏見。

<sup>127</sup> 劉錫鴻（撰），《日耳曼紀事》，〈西人厭有家之拘束〉，頁224。

<sup>128</sup> 至於五倫的作用，劉錫鴻解釋：「君臣相愛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愛而喬梓之道明，兄弟相愛而長幼之序明，夫婦相愛而內外之辨明，朋友相愛而敬讓之誼明。藹藹乎，秩秩乎，雍穆整齊，不因好勝而奮爭心，不恣貪欲而動殺機，生靈之禍，即於是乎息」。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觀電學有感〉，頁129。

<sup>129</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人知禮〉，頁74。

<sup>130</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新聞紙之報導〉，頁95。

<sup>131</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播犁地士母席庵〉，頁111,113。

<sup>132</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倫敦多善舉〉，頁153。

<sup>133</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人講求教養〉，頁208。

<sup>134</sup> 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卷2〈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兩生中丞書〉，頁282。

最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錫鴻對西洋政體的一些評價。1877年4月，郭嵩燾在與井上馨的會談中得知，在西洋諸國，是以土地稅為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除去茶、煙草、酒等之外的物品，均不徵稅；商人申報納稅為年總所得的八十分之一，且未滿三百英鎊者亦免除納稅義務<sup>135</sup>。郭氏與井上氏會談時，根據郭嵩燾的記錄，同席的劉錫鴻提到，此法誠善，然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相對於郭嵩燾的記載，《英軺私記》僅說道：「民既獲利，輸納自非所難，由是而樂於運販者多。販運多，則銷流廣。業農工者，不自待驅迫而咸勤於作苦以供所需。英國富民之道，莫善與此」，文中沒有提及「君民兼主國政」一事<sup>136</sup>。倘若郭嵩燾的記載無誤，而劉錫鴻也確實僅是缺記自己的評論，則劉錫鴻於赴英之前，對庶人參政的「國主官商之體制」抱持批判，而支持「政令統於一尊」之皇帝專制政體的態度；在抵英歷經實地體驗與考察後，已轉而讚賞「君民兼主國政」體制，即君主立憲政體。在《英軺私記》中，雖然看不見劉錫鴻對皇帝專制體制在原理上的反省與批判痕跡，亦無如同晚清的立憲運動一般，主張採用立憲主義來謀求恢復皇帝的權力<sup>137</sup>。並且，劉氏也尚未意識到，君主立憲制是試圖將君主的權威和其統治的正當性，收編進國家的法律體系中。在劉氏的想法中，沒有懷疑以德治主義為軸心的皇帝專制體制，也沒有企圖強化君權，甚至沒有意識到立憲主義是在憲法中賦予君權的優越地位。例如：學者張宇權據《英軺私記》〈英國衙門官制〉，「刑司以其律例，與國君抗衡」的記載，解釋劉錫鴻已經初步地認識到「英君主立憲制得以實行，這和它的法制完善是有關係的」。然而，細察劉錫鴻記錄的原文，在「刑司以其律例，與國君抗衡」後，緊接著「教師以其教，與國君抗衡」之論述。依筆者之見，在1877年2月時，劉錫鴻只不過在概念上承認刑司與君主具有同等地位而已，劉氏是否正確地掌握「近代法」（基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所形成的法規範）對君主立憲制的作用，頗有疑問。另外，學者雷俊玲引用《英軺私記》〈英倫訊案規模〉，「刑司之權，足以訊治其國主王公大臣」之語，從而說明劉錫鴻已經體會「西洋治民以法，治民者亦不外於法」。但〈英倫訊案規模〉之記事，其實僅止於指出英國近代法所內含的拘束力與其限制範圍，並未必意味著劉錫鴻已經認識到

<sup>135</sup> 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頁165-166。

<sup>136</sup> 郭嵩燾（撰），《郭嵩燾日記》，3（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光緒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頁178；劉錫鴻（撰），《英軺私記》，〈井上馨談學西洋〉，頁120。

<sup>137</sup> 清廷試圖強化君權，在《憲法大綱》（1908）之前文中，可以窺見。村田雄二郎，〈中國皇帝と天皇—一つの比較視座〉，《帝國とは何か》，頁124。

君主的權威與其正當性必須立足於法治之上。綜合以上兩點，筆者認為劉錫鴻在英期間，實尚未瞭解近代法治主義與立憲主義之真諦，始終從「聽從民意」這一儒家思想的脈絡來評價西洋政制<sup>138</sup>。當然，劉錫鴻對於立憲制的讚賞，實際上，也象徵著他對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讚賞，但此一讚賞究竟是基於何種認知框架？卻是一個需要再深入研究的問題。

有關這一點，溝口雄三指出，對於劉錫鴻來說，「問題不在於君主專制或立憲制等體制的抉擇，而在於上述二點能為『民樂』帶來什麼？」這也就是說，溝口雄三認為，所謂「民樂」是指「予民方便有利」，或「在於使民自適、在於使官吏自適」。由此可知，「民樂」概指民生的富裕<sup>139</sup>。劉錫鴻的觀點確實是基於民生富裕為出發點，殆無疑義。因此，溝口雄三再指出，劉錫鴻認為君主立憲政體「被視為商業主導型的體制，倘若因此而阻礙了中國的『民樂』，當然被判定為不善；反之，它被確認充實了『民樂』的話，價值便轉而為善」的說法，是相當得當的<sup>140</sup>。但是，溝口雄三對於其他研究者提出劉錫鴻「在渡英之後，很快就達到了從制度上保證」民樂，是「須靠地方士紳的自治制度的意識」的說法，則尚有疑問<sup>141</sup>。事實上，劉錫鴻固然讚揚英國的地方官制度選舉，即地方市議員（councilor）與市參議員（alderman）的選出方式，然而有關英國鄉官的主要焦點，在於以民選為防止貪污，「民樂」說起來就像是這項成就所帶來的附加價值。正如同劉錫鴻自己的評論，若是認定了以地方自治為根基來實現「民樂」，那就不是讚賞君主立憲制，而是稱讚地方自治了<sup>142</sup>。

在此，還有一點相當值得重視，那就是維多利亞女王所具有的「象徵性」。正如堯、舜、上古三代所象徵著優秀的政教制度，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象徵著「中國盛世」（Pax Sinica），劉錫鴻因此將他對於英國「民樂」的讚賞，原封不動地與稱讚維多利亞女王聯繫在一起。依據佐佐木揚的研究指出，郭嵩燾赴歐後，建立了善政在夏、殷、周、秦、漢之後斷絕的歷史觀。基於此一歷史認識，郭氏認為與近代西洋文明具有抗衡關係的，不是當代的清國，而是上古三代。這

<sup>138</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國衙門官制〉、〈英倫訊案規模〉，頁85,136；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03；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德認識〉，10《輔仁歷史學報》，頁205。

<sup>139</sup> 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287-288,291。

<sup>140</sup> 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291。

<sup>141</sup> 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293-294。

<sup>142</sup> 見《英軺私記》，〈英國地方官之制〉：「此制與漢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然其所舉著富民，舉之者亦富民，官不復參預其事。惟所舉者富，故無貪黷之憂；惟舉之者富，故無賄囑之患。惟官不預其事，故無仰承俯注之難。以民治民，事歸公議」。劉錫鴻（撰），《英軺私記》，〈英國地方官之制〉，頁159。

也就是說，郭嵩燾試圖藉由親身經歷的西洋體驗，回歸「三代之治」的儒家理想。另外，將善政比作三代之治的思維方式，亦可從王韜的言論中看出。曾遊歷歐洲與日本，並在香港創刊《循環日報》、提倡變法的王韜，對於英國的政治體制說道：「英國之所恃者，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弢園詩文集》）。由此，筆者認為，無論思想取向（洋務派、變法派、守舊派）的差異，在持有所謂「尚古史觀」的中國人，此一思維方式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sup>143</sup>。劉錫鴻似乎也受此一觀點的影響，而將英國「民樂」的實現，定位在維多利亞女王與立憲君主的關係上進行理解，並依附上古善政的觀點，由此轉化為對立憲主義的讚賞。似乎正是這樣的思維方式，形成了劉錫鴻對君主立憲制給予肯定性評價的原因。

## 伍、世界認知的建構

最後，在劉錫鴻如何認知當代的世界、如何建構其認知體系方面，本文將逐一地探討劉錫鴻對當時西歐諸國之間存在著何種國際秩序，以及清國與此一秩序之間應該建立什麼樣的關係等問題為核心，嘗試加以釐清。

為對拿破崙戰爭（1803-15）進行戰後處理，自 1814 年至 1815 年間，在梅特涅（Metternich）的主持下，歐洲各國召開了維也納會議（1814-15）。其結果是，以泰裏朗（Talleyrand）所主張的正統主義和勢力均衡為基本原則，構建了新的國際秩序——「維也納體制」。在維也納體制中，對於涉及到國境變更等微妙的政治問題，需透過超越對立的大國間的協調，即透過五國同盟<sup>144</sup>之「會議外交」，且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加以解決。這也就是說，歐洲各大國在維也納體制下，都有一個基本的共同意識，即旨在積極、努力地維持和平與勢力均衡，並以維持和平與勢力均衡的共識為前提，進而實現了「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sup>145</sup>。

在維也納會議中唯一被排除在外的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key）帝國，

<sup>143</sup> 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頁175-178。

<sup>144</sup> 五國同盟係為維持「維也納體制」，並透過定期的協議，期為阻止革命與撫平國際紛爭之軍事、政治同盟。該組織原本是由英、俄、奧、普為主所組成的四國同盟，直到1818年的聯合會議上，四國同意法國的加入，而成為五國同盟。

<sup>145</sup> 見倉持俊一，〈アレクサンドル1世の時代〉，收於田中陽兒，倉持俊一，和田春樹（編），《ロシア史2》（東京：山川出版社，1994），頁130-132；倉持俊一，〈デカブリストとニコライ1世の時代〉，《ロシア史2》，頁182-184。

則因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56）中，與英法結成同盟，共同對抗俄國；並且根據戰後的巴黎和會（1856），首度成為非基督教而被允許加入「歐洲協調」的國家<sup>146</sup>。關於克里米亞戰爭的經過，劉錫鴻論述道：

其（土耳其）王（蘇丹）本韃靼種，奉回回教，以刑斂煩苛代傳為衣鉢。又偏袒回族，非回咸不授官。東西藩部服天主、耶穌、希臘教者，皆環甲以叛，勢成瓦解。俄羅斯因之謀吞併，以通海道，蓄志蓋有年矣。咸豐六年，俄人大舉侵伐，英、法兩國恐其滅土為禍歐洲也，夾持之，勸土王入萬國公會以自固，兵燹得少息。<sup>147</sup>

由此可以看出，劉錫鴻顯然已經理解西洋之國際秩序的微妙之處。也就是，西洋諸國在和平與均勢方面已經達成共識，一旦有破壞這種均勢的強國出現，便會一致地加以對抗。

然而，就在廢除「黑海中立化條款」以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的保加利亞（Bulgaria）、塞爾維亞（Serbia）、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的民族獨立運動開始高漲。1876年4月的保加利亞，同年6月的塞爾維亞和蒙特內格羅（Montenegro），也都相繼發生了要求政治獨立的事件。由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嚴厲地鎮壓以基督教（希臘正教）為共同宗教信仰的斯拉夫民族之叛亂，引起了西歐諸國輿論的強烈反彈。俄國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分裂為入侵地中海之藉口，於1877年4月，打著救濟基督教徒之大旗，與土耳其開戰。翌年1月，亞得裏諾布林（Adrianople）陷落後，土耳其的敗局已定，同年3月，雙方簽定了「聖斯泰法諾（San-Stefano）條約」。在該條約中，俄國除了認可羅馬尼亞（Rumania）、塞爾維亞、蒙特內格羅獨立之外，還將保加利亞作為自治公國，置於俄國的保護傘下。由此窺破俄國南下意圖的英、奧兩國，決定不承認聖斯泰法諾條約，並要求召開會議，對條約內的所有條款進行審議。在德國首相俾斯麥（Bismarck, 1815-1898）的主持下，召開了柏林會議，結果使得聖斯泰法諾條約遭到廢除，俄國入侵地中海的企圖遭到挫敗。關於土俄戰爭，劉錫鴻論述道：

布加力為瓦拉基都城，與波斯黎亞、赫斯哥非納兩部皆耶穌教，多俄種。回民訐以謀叛，請諸蘇爾丹，集鄉兵圍之，淫掠屠殺殊慘。俄人陰唆其眾，連臂奮起。塞爾維亞國、捫德黎哥羅國遂相繼稱兵。……俄人顧畏公法，不敢公言助戰，爰使士卒偽為投軍者赴塞國壘。故塞師翟乃由莠為俄世臣，又命親王尼可拉士將重兵屯黑海以觀釁。英人憂之，撥兵船二十握麻西戛灣（土國都城君士但丁外馬木拉海出地中

<sup>146</sup> 這時在巴黎和會上，除戰爭當事國的俄國與土耳其之外，英、法、奧、義、普國都介入此一和約的簽訂，達成和議讓達達尼爾、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及黑海保持中立。參閱倉持俊一，〈アレクサンドル1世の時代〉，《ロシア史2》，頁130-132。

<sup>147</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馬格里言土耳其事〉，頁88。

海之水口)，傳東德、奧、意、法諸盟邦，特簡大臣會集，爲土謀息爭。……英使沙爾斯伯里議停半年，更土政，立約章，俾回族不得凌虐他教。<sup>148</sup>

西洋例，凡入萬國公會者，同盟之國不能無故加兵。俄羅斯謀併土耳其以通海道，執土政之亂爲詞，英人約會各國夾持之，俄遂未敢公然用武。<sup>149</sup>

引文中值得注意之處，顯示出劉錫鴻對於西歐諸國間國際關係與解決紛爭的理解。當破壞諸國間相對穩定的強國出現時，其他國家會聯合出面加以牽制，甚至聯合加以制裁。藉由土俄戰爭之例，劉錫鴻更進一步瞭解在西歐國際社會中均勢主義、結盟主義以及國際公法的效用，可以促使列強相互制衡。

以上，透過觀察劉錫鴻對於克里米亞戰爭與土俄戰爭的相關言論，可以說，劉氏在西歐的體驗過程中，其對於世界的認知框架與建構元素，基本上是根據尋求均勢、穩定因素的「勢均力敵」模式，來瞭解西洋諸國多元化的關係。

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有關於清國內的鐵路建設問題。在自強運動期間，鐵路建設並非出於清國的意願，而是來自西洋諸國期為擴大商品流通，並試圖將其勢力深入清國的動機下提出。有關鋪設鐵路之問題，劉錫鴻則是應用了使歐經驗所學到的，根據國際法中「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主張應該拒絕西洋諸國之要求。例如，在〈始見火輪車〉記載：「英人他日有持火車之說相商相勸者，當以是喻之。其或相逼勒，則請正告曰：此我之內政也。自主之國，他人不得預其內政，爾萬國公法固云然，今奈何相強邪？」<sup>150</sup>。再者，關於釐金問題，他更主張，「蓋我原有自主之權，釐金應取諸我民則自取之，非外人所能過問也」<sup>151</sup>。在此，雖然劉錫鴻已經注意到國際法的約束力，或可以在國際公法的基礎上保護國家主權，意欲阻止西洋諸國對清國的入侵，卻似乎沒有考慮到清國自身也應受到國際公法的制約。並且，正如前文指出，因劉氏是以「五倫」爲基礎，將清國與西洋諸國嚴格分爲「華／夷」。進而，他也認爲即便是身爲「蠻夷」，只要確立了「五倫」、努力推行德治，蠻夷也有可能升格爲「華夏」。由此可以說，劉錫鴻將清國與西洋諸國的關係定位爲「華／夷」這類本質相異的上、下關係，而對於西洋諸國間的國際關係，又是通過均勢的框架來理解。簡言之，劉錫鴻世界觀的特色在於，將傳統的華夷世界觀與使歐後所觀察到的均勢模式，明顯地加以區分、運用。

<sup>148</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馬格里言土耳其事〉，頁88。

<sup>149</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總論英國政俗〉，頁111。

<sup>150</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始見火輪車〉，頁63-64。

<sup>151</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洋貨免厘金之稅〉，頁146。

## 陸、結論

綜觀劉錫鴻在出國前對西洋各國的認識、如何建構西洋觀，可以從內政、外交等議題的論述中加以觀察。首先，在內政方面，以牡丹社事件為契機，在清廷內部，「自強」——必須強化海防的呼聲日趨強烈。洋務派所關注的自強內容，大致上是購買或製造洋式艦船、振興運輸、通信與工礦產業。但是，劉錫鴻認為「自強」並非透過技術性操作就能夠簡單實現。總之，他不以機器為足，認為若無法從根本進行內政改革，即使一味購置船炮，仍不能臻中國於富強。這是當時傳統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政治概念，其觀點源於重視內政和重視政治人物之素質的立場，也就是從修身、齊家乃至於治國，一套循序漸進的思維模式。特別是在塞、海防之爭時，劉錫鴻所關心的是國家的安定，對於當時清國所面對所的外患，雖未提出有效、具體的解決方案，但卻明確地指出吏治敗壞的現象，以及此一現象與捐納制度、浮濫保舉之間的密切關係。同時，他也過分樂觀地以為西洋各國東來雖具威脅性，但實無領土野心，洋人志在通商而已，因此不會構成清國的國防安全問題。基於這種過分樂觀的認識，劉錫鴻便展開了以設置砲台為主導思路的防衛論。

在理解政治制度方面，劉錫鴻依據傳統的華夷觀念，將西歐諸國視為「蠻夷」，視其為天子教化對象，更將士庶、商人階層參政的「國主官商之體制」，視為評價蠻夷的標準與依據。換言之，只要貫徹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政治文化，清國即能為「華夏」；反之，不能實踐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政治文化，即是「蠻夷」。形成這套標準的原因，顯然與介紹、認識西洋的資訊不足有關。

在瞭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國際形勢方面，劉錫鴻從《瀛寰志略》等著作中獲得了一定的知識，但獲得資訊的渠道並非從西方當地直接取得。即使劉錫鴻對西歐表現出傾向好感的評價，但或許也不能排除如此的可能性，即因資訊來源受到限制而套用《瀛寰志略》等書的價值觀，或受其影響。雖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劉錫鴻與當時的保守人士相當不同，他並不會以盲目排外的心態一味地詬罵洋人。

對於英國統治殖民地的方法，劉錫鴻以土司制度為名，合理化其統治方式，並對其統治技術給予肯定性的評價。然而，此並非意味著劉錫鴻是基於殖民現代性的觀點——即西方文明的啟蒙對非西方世界的物質、精神生活的提升有重大貢獻

一上承認殖民政策。他對錫蘭居民的觀察，已事先被傳統典範所限制，因此他雖意識到被殖民者的貧困，但終究無法察覺到殖民統治所隱含的負面效應。

再者，我們還可以從劉錫鴻的身上觀察到如此的傾向，也就是依據「勢均力敵」（均勢）的模式來理解西歐諸國之間與清國的互動關係。劉錫鴻雖然認為應該在西歐諸國之間採取「合縱連橫」的策略，可以由此帶來勢力的均衡而維繫著歐洲的相對穩定。儘管如此，他卻尚未意識到「均勢」模式不僅對西歐諸國間是穩妥的，清國也應該是這個國際局勢中的一個成員。但至少他已經跨越了傳統「以夷制夷」的概念，進一步認為有關西方各國涉及清國的事務與利益時，應尋求西方國家之間的均勢。

如上所述，渡英之前的劉錫鴻，係依照傳統的華夷觀念，將西歐諸國視為清國天子教化的對象。其依據是，民為治政之主體，此乃作為民主主義議會制發揮作用的「國主官商之體制」。在清國，人民是赤子，被要求按照恭順原理，服從於一人的獨裁君主。若以這種「一君萬民」之觀念，是不可能認同愚民參政的「國主官商之體制」。

但當劉錫鴻使歐後，特別是對英國政治制度之實情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之後，劉錫鴻則認識到，英國君與民、上與下之間的隔閡並不存在。另外，英國透過福利政策、教育制度來謀求民生的充實，使得劉錫鴻最後對英國政治作出「善治」的評價。正如「聖人之教，萬古不變」所言，劉氏作為典型的傳統知識份子，對於傳統價值之普遍性抱持著絕對服從的信念。即是說，他是以前傳統思想中所包含的普遍性，來順推、轉化或解析西洋文明。所以，「英國＝善治」此一認識，充其量不過是參照儒教的價值標準，而在此基礎上被轉化、理想化的西洋形象，並非基於英國的政治是君主立憲制，便認為其優越。劉錫鴻只是參照其堅信的價值標準，將英國現實情狀加以轉化，而使英國在黃金時代的表現足稱為善治罷了。筆者認為，在此應特別注意劉錫鴻心理上的處理方法，即在不轉變自己價值觀念的基礎上，對其他事物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共鳴。

就這樣，劉錫鴻以傳統的理念為基礎，認定英國政治為「善政」；然而，他卻決不承認英國與清國是具有同等資格的國家。即使是在渡歐之後，仍舊繼續將清國與西歐的關係定位在「華／夷」對應模式中。這種認知框架，與以確立五倫秩序當作「華夏」的基本條件，密不可分。這也就是說，劉氏將五倫的概念，與「華／夷」這個儒教的二分法相結合，認為長期以來，只有用五倫來維持的清國才是文明的「華夏」。另外，以「善政」加以序列化的意識型態有可能傷害到自己，因此，劉錫鴻從親身體驗西洋諸國的經驗中，以「五倫」的存廢作為「善政」

的代替品，並在事後找出將清國與西方諸國加以區分的差異標準。

此外，劉錫鴻在首度與新科技產物，如火車、機器印刷、機器鑄製錢幣等照面時，即使劉氏往往會寫下驚奇之感；如始見火車時，寫道：「程之慢者，一時亦百餘里，故常數晝夜而萬里可達」，而驚嘆「技之奇巧，逾乎縮地也」<sup>152</sup>。然而，劉錫鴻並非以全然接受者的角度，試圖享用新科技帶來的便利。劉錫鴻總是在驚奇之餘，開始思索各種「文明物」可能產生的社會或政治方面之負面問題與效應。

然以行諸中國，則裸股肱、執策綏、操舟挽輦以度載人貨者，莫不盡廢其業。……我聖朝綏奠群黎，同安樂土，農工百藝，莫肯輕去其鄉。……不及半載，勢將乘坐寥寥，求抵一日之煤費工需，而不可必得，遑問本息？……是故火車之不能行於中國，猶清靜之治不能行於歐洲，道未可強同也。<sup>153</sup>

對於英國的政治，劉錫鴻認為即使該國在父子、男女、貴賤之間的問題，以及在道德上缺乏秩序等問題的情況下，亦仍不得不承認其為「善治」。因此之故，實不難想像，當他面對「英國無冗官，無遊民，無官民上下之隔閡，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之情況時，如此的「善治」，卻反而讓劉氏堅持信念，即五倫之優越意識更加提高。細察劉錫鴻對於西洋諸國缺乏「五倫」之事例，逐一仔細論證的做法，似乎正是基於現實受挫而欲凸顯其堅持的心理背景。相對於郭嵩燾全面肯定英國文教興盛與政制之善，甚至尤有超過清國之處，進而承認西洋諸國對清國的舉措，幾乎可以歸類為對「野蠻人」所施加的「文明化」<sup>154</sup>；劉錫鴻也許正因為如此，或感受到價值觀即將崩潰、瓦解的危機意識，他始終將「五倫」的價值，安排在「善治」的上位。無論是在駐歐期間，甚至直到最後，劉錫鴻依舊無法接受郭嵩燾全面肯定英國、全盤西化的看法。

同時，對於劉錫鴻的西洋觀而言，還應注意的是，過去研究中常出現的結論，如劉錫鴻「在西洋體驗之過程中，大大加深了其對西洋的認識，以致於對西歐的政教與風俗作出了肯定的評價」<sup>155</sup>，似乎仍未能完全、精確地掌握劉錫鴻的觀點。其實劉錫鴻在出洋前，就已對西洋抱有愛憎交織的複雜心理。此即，對傳統夷狄觀與西洋政治的部分性肯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年餘的使歐，除了是劉錫鴻

<sup>152</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始見火輪車〉，頁62-63。

<sup>153</sup> 劉錫鴻（撰），《英軺私記》，〈始見火輪車〉，頁63。

<sup>154</sup> 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頁178-179。

<sup>155</sup> 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2）—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8.1，頁101。

一方面對《瀛寰志略》等書所論及的西洋優點，進行「再確認」之外；另一方面，也是他「再發現」西洋優異的政治、社會、民情表現的驚奇之旅。再者，當他置身於西方世界之中，亦體會到借助均勢主義與結盟政策、運用國際法的力量，使國家之間相互制衡，這是在清國面對西洋諸國時，在國際外交上最有效的策略。總之，劉錫鴻將清國與西洋諸國的關係定位為「華／夷」這類本質相異的上、下關係，而對於西洋諸國間的國際關係，又是通過「勢均力敵」（均勢）這一框架來加以瞭解。劉錫鴻世界觀的特色即在於，將傳統的華夷世界觀與均勢模式，加以區分與運用。

## 徵引文獻

### （一）史料

- 1.清·王闈運（撰），《湘綺樓日記》，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4年。
- 2.清·李慈銘（撰），《越縵堂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 3.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4.清·汪兆鏞（輯），《碑傳集三編》，17《劉錫鴻傳》，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 5.清·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29，台北：華文書局，1968年。
- 6.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清史稿》，台北：鼎文書局，1975-1981年。
- 7.清·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番禺縣續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49，台北：成文出版社1931年排印本影印，1967年。
- 8.清·郭嵩燾（撰），《郭嵩燾日記》，3，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 9.清·劉錫鴻（撰），《日耳曼紀事》，收於鍾叔河（主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6年。
- 10.清·劉錫鴻（撰），《英軺私記》，收於鍾叔河（主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6年。
- 11.清·劉錫鴻（撰），《劉光祿遺稿》，收於楊家駱（編），《自強運動文獻彙編》，1，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 12.清·劉錫鴻（撰），《劉錫鴻任內卷略》，收於劉錫鴻（撰），《駐德使館檔案鈔》，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年。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2，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
14. 楊家駱（編），《自強運動文獻彙編》，5，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 （二）專書

1. Fairbank, John K.、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1800-1911（下）》，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
2. 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文化，2002年。
3.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0年。
4. 中井英基，《張謇と中國近代企業》，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1994年。
5. 片岡一忠，《清朝新疆統治研究》，東京：雄山閣出版，1991年。
6. 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
7. 吳寶暎，《初出國門：中國早期外交官在英國和美國的經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
8.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9. 李華興，《中國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
11. 厚候吉、吳其敬（主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茂木敏夫，《變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
13. 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14. 福武直，《福武直著作集：中國農村社會の構造》，9，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
15. 趙靖、易夢虹（主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三）論文

1. 大谷敏夫，〈海國圖志と瀛寰志略—中國近代における最初の開明地理書〉，《鹿

- 大史學》，27（鹿兒島，1979.12），頁 1-30。
- 2.大谷敏夫，〈清朝君主權と士大夫〉，收於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 480-504。
  - 3.大谷敏夫，〈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動向〉，收於大谷敏夫，《近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舎出版，1995），頁 52-95。
  - 4.大谷敏夫，〈清末經世思想の二大潮流〉，收於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舎出版，1995），頁 119-156。
  - 5.公一兵，〈走近洋務運動中の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8.6（呼和浩特，2002.12），頁 18-22。
  - 6.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1)—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7.1（福島，1998.7），頁 1-16。
  - 7.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體驗と世界像の變動(2)—文明觀と國際秩序觀〉，《商學論集》，68.1（福島，1999.8），頁 93-104。
  - 8.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學術月刊》，4（上海，1995.4），頁 76-81。
  - 9.史革新，〈倭仁與晚清理學〉，《中州學刊》，4（鄭州，1997.4），頁 154-159。
  - 10.伊藤桃子，〈清末における對外認識の諸相—倭仁と劉錫鴻の西洋觀を中心として〉，筑波：國立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11.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思想》，849（東京，1995.3），頁 61-84。
  - 12.坂野正高，〈鐵道論—1879年の二つの意見書〉，收於坂野正高，《中國近代化と馬建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頁 122-23。
  - 13.佐久間重男，〈明・清から見た東アジアの華夷秩序〉，《思想》，796（東京，1990.10），頁 38-51。
  - 14.佐佐木正哉，〈中國における共和思想の展開と臺灣民主國獨立運動始末（上）〉，《近代中國》，18（東京，1986），頁 105-108。
  - 15.佐佐木揚，〈同治年間後期における清朝洋務派の日本論—李鴻章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44.3（京都，1985.12），頁 430-458。
  - 16.佐佐木揚，〈郭嵩燾（1818-91年）の西洋論—清國初代駐英公使が見た西洋と中國〉，《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38.1（佐賀，1990.8），頁 162-200。
  - 17.佐藤慎一，〈儒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國—社會と文化》4（東京，1989.6），頁 34-54。
  - 18.村田雄二郎，〈王朝、國家、社會—近代中國の場合〉，收於溝口雄三、濱下

- 武志、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4（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頁 37-68。
19. 村田雄二郎，〈中國皇帝と天皇——一つの比較視座〉，收於山内昌之、増田一夫、村田雄二郎（編）《帝國とは何か》（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 111-133。
  20. 並木頼壽，〈中國における《近代》への對應——自強運動をめぐる中國と日本の論争に觸れて〉，《季刊中國研究》，9（東京，1988.2），頁 97-106。
  21. 林家有，〈序言〉，收於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頁 1-2。
  22. 茂木敏夫，〈李鴻章の屬國支配觀〉，《中國——社會と文化》，2（東京，1987.6），頁 89-117。
  23. 茂木敏夫，〈劉錫鴻《英軺私記》の世界觀〉，《南京大學學報（社會史專輯）》，（南京，1989），頁 107-112。
  24. 茂木敏夫，〈近代中國のアジア觀——光緒初期、洋務知識人の見た「南洋」〉，《中國哲學研究》，1（東京，1990.8），頁 94-119。
  25. 茂木敏夫，〈中華世界の「近代」的變容——清末の邊境支配〉，收於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 269-299。
  26. 茂木敏夫，〈清末における「中國」の創出と日本〉，《中國——社會と文化》，10（東京，1995.6），頁 251-265。
  27. 吳安家，〈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 41-64。
  28. 倉持俊一，〈アレクサンドル 1 世の時代〉，收於田中陽兒，倉持俊一，和田春樹（編），《ロシア史 2》（東京：山川出版社，1994），頁 130-132。
  29. 倉持俊一，〈デカブリストとニコライ 1 世の時代〉，收於田中陽兒，倉持俊一，和田春樹（編），《ロシア史 2》（東京：山川出版社，1994），頁 182-184。
  30. 宮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5（北京，1987.9），頁 119-128。
  31. 馬秀平，〈倭仁理學思想論略〉，《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6（福州，2002.3），頁 1-5。
  32. 張宇權，〈論劉錫鴻出使前的社會交往〉，《學術論壇》，162（2004.1），頁 154-157。
  33. 溝口雄三，〈近代中國像の再検討〉，收於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

- 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頁 35-87。
- 34.溝口雄三，〈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收於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頁 269-299。
- 35.雷俊玲，〈清末駐歐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輔仁歷史學報》，10（新莊，1999.6），頁 170-216。
- 36.熊月之，〈論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紛爭〉，《華東師範大學學報》，50（上海，1983.6），頁 75-81。
- 37.潘光哲，〈書評：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漢學研究》，23.1（台北，2005.6），頁 509-513。
- 38.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における「アジアとヨーロッパ」〉，收於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頁 217-259。
- 39.濱下武志，〈東アジアに見る華夷秩序〉，《國際交流》，62（東京，1993.11），頁 28-36。
- 40.鍾叔河，〈劉錫鴻「用夏變夷」的失敗〉，收於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38-259。

# Liu Xi-Hong, the First Qing Dynasty Deputy Ambassador to British, his thought and impressions of the West

ITO, Momoko\*

## Abstract

After Opium War, late imperial China was exposed to western military incursions repeatedly and began its modernizations. Some gentries had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sponding to these western invading pressures. They were also known as the conservatives in late Qing. Above all, they had already rooted deeply in the past Sino-Western contacting history. One remarkable figure in late Qing was Liu Xi-Hong, the first Qing Dynasty deputy ambassador to British, who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servatives. What was the gentries' main point of view in the western world? How did they recognize the world? What were the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te western views and traditional views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wo main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to explore Liu Xi-Hong's thought, especially his view of the west before and after he left for London. This paper will use some resources, such as Liu's memoirs, "*Ying-Yao Si-Ji*(英軺私記)", and official records, "*Liu Guang-Lu Yi-Gao*(劉光錄遺稿)" and so on. The other main question is to examine his view of the world and Sino-Barbarian Ideology(華夷觀念) in context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Key Words** : Liu Xi-Hong(劉錫鴻), conservatism, western view, worldview, Sino-Barbarian Ideology(華夷觀念)

\* Lecture,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Tajen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